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 闻 道

## ◎学人讲坛

维克多·拉林教授：俄罗斯远东发展新战略

## ◎国际问题

“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在伊拉克传媒战中的作用探析

## ◎学术随笔

论斯达尔夫人的政治思想

## ◎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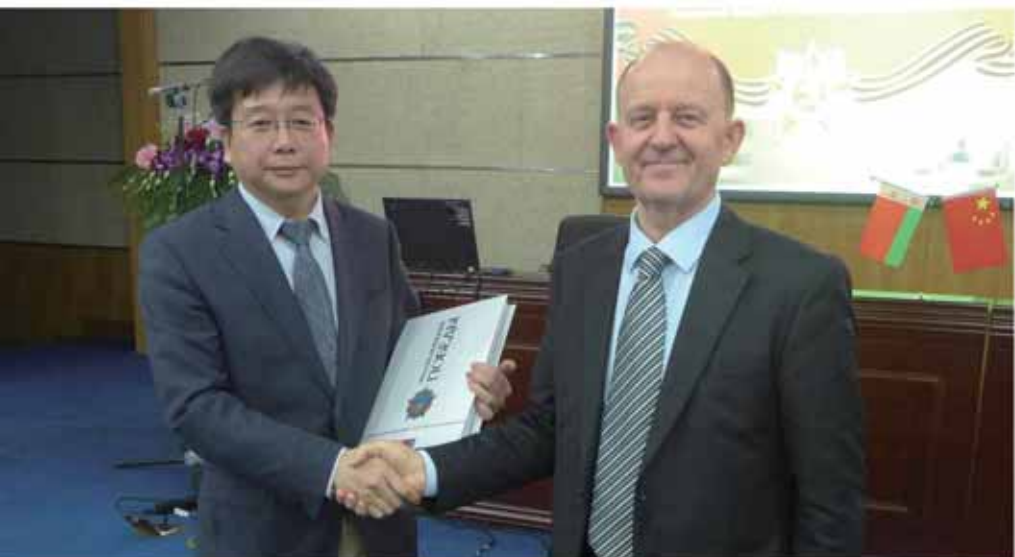
乌克兰危机

2014年第2期

总第13期



我校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周年、白俄罗斯解放70周年活动



维克多·拉林教授做客大夏讲坛，  
解读俄罗斯太平洋政策



Fred Schrader 教授关于  
马克思手稿研究的系列讲座



## 卷首语

对世界各种古老文明的相比较之下，大概是华夏文明的古代经典对于“学习”的问题最为关注，也给予了最高的地位。

这可能是除了政治背景之外，中华文明何以历经沧桑而经久不衰的深层原因之一。

为了能更有效、合理地处理国际事务和推行对外政策，国人的唯一坦途除了学习，可能还是学习。

学习首先是读书，当然完全不限于书本知识，每做一项功课、每作一篇发言、每处理一件事务、每做一回交往，都是学习的过程和机会，就看是否用心，而不马马虎虎。

学习和研究国际问题，就像任何知识门类一样，学的是各种道理，需要主动培养的是思维判断能力和实际应用技能。

尤其是当下这样一个专业人才奇缺的时刻，希望有更多有志青年，投身于国际研究这一令人神往而又叹为观止的领域。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2014年第2期

总第13期

主 编：蒋霁望

副主编：

李后立 李沁笛

蔡一麟 李 娟

国际关系与地区  
发展研究院

《闻道》  
编辑部主办

## 目 录

### 卷首语

院长寄语..... 冯绍雷

### 学人讲坛

维克多·拉林教授：俄罗斯远东发展新战略  
..... (1)

### 国际问题研究

“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在伊拉克传媒战中的作用探析  
——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的解读  
..... 周 鹤 (9)

自治、族群 - 区域联邦主义与族群 - 民族主义  
——南奥塞梯分离的发生学  
..... 孙 超 (27)

### 学术随笔

论斯达尔夫人的政治思想  
..... 陈 曦 (47)

如何以自愿原则为基础合理推导出私人所有权？  
..... 杨一帆 (61)

### 天下

乌克兰危机  
..... (71)

### 名人名言

..... (75)

## 百花齐放

- 人性：在个人与体制之间  
——关于《窃听风暴》的浅思  
..... 李 雪(76)
- 谎言、诱惑和陷阱——读《激进民主》有感  
..... 田 田(79)
- 畸形的反抗——读《自杀与美好生活》有感  
..... 李沁笛(82)
- 守望者：黑色的欲望，黑色的选择  
..... 王晓威(86)

## 专题报道

-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卢基扬诺夫  
到访我院  
..... (89)
- 李成谈“美国思想库：缘起、发展与前景——以布  
鲁金斯学会为例”  
..... (91)

## 国关要闻

- ..... (93)

## 编 辑：

(按拼音字母为序)

费梦戈 关婧雯 古娅珂  
华 盾 黄敬荣 黄仲凯  
李春燕 李 括 孟 舒  
王晓笛 王亦冰 王韵涵  
席天士 杨骐铭 杨晓娜  
叶 锟 张洪玉 赵舒婷  
朱文青

封面题字：冯绍雷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 座 410 室  
邮编：200062  
邮箱：ggwendao@gmail.com  
网站：<http://www.saias.ecnu.edu.cn/il265.htm>

注：未获本刊事先许可，任何单位  
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馮詒書

溝通的渠道

交流的平台

廣發智慧

砥礪思想

分享知識

奉獻感悟

貝文

## 学人讲坛

**维克多·拉林教授：**现为俄罗斯远东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东方学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被公认为是俄罗斯国内研究远东和西伯利亚问题最杰出的学者，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在国际学术界被广泛认可。受聘为滨海边疆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议会专家委员会成员。拉林教授同时担任中俄友好协会滨海边疆区分会主席，2010年荣获“中俄关系60周年杰出贡献奖”，为中俄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讲座主题：**俄罗斯远东发展新战略

**讲座背景：**2014年5月21日，经过中俄两国领导人双边会晤正式签署中俄“天然气协议”。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邀请了维克多·拉林教授到本院与师生展开了以“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为主题的讨论，正切当前热点话题。特此在本期《闻道》杂志学人讲坛中进行了摘录。

## 一、俄罗斯远东地区（俄罗斯太平洋地区）

### 1. 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及其特点

俄罗斯太平洋地区，主要指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更趋向于亚太国家和地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俄罗斯的太平洋地区。

首先，在外贸结构上，俄罗斯太平洋地区80%的对外贸易额集中

在中日韩三国。如果加上其他国家，90%是与东北亚国家间的贸易。

第二，在每个（与此相关的）文件中都谈到，俄罗斯制定的所有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战略或纲要都是要将当地经济融入亚太地区。

第三，在社会意见方面，普通俄罗斯人认为：西伯利亚地区应该首要发展关系的地区是中国，接下来是日本，然后是韩国，最后才是俄罗斯欧洲部分、欧洲和美国。

## 2. 发展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原因

从 20 世纪到 21 世纪，俄罗斯多次强调要发展太平洋地区。这一政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就是总统普京。是哪些因素促使俄罗斯的动向发展呢？这里面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地缘政治因素。控制俄罗斯太平洋地区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俄罗斯成为亚洲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实际控制西伯利亚的远东地区，俄罗斯就称不上一个大国。早在 2002 年，俄罗斯总统就提出：“这一地区对俄罗斯有重大战略意义。”这一提法一直适用到现在。

第二，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是俄罗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能源。有人提出，这一地区是俄罗斯现代文化的重要来源。2012 年普京提出：“远东地区是俄罗斯繁荣强大的最重要因素。”

第三，太平洋地区就像是俄罗斯维持东方和西方平衡的基础因素。就像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一个头向西，一个头向东。但实际的情况是，一个头看着西方，另一个头也在看着西方。所以俄罗斯现在的任务是使两个头朝向应有的方向。

## 3. 发展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阻碍

虽然俄罗斯制定了发展太平洋地区的任务，但仍存在三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一，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生活舒适度比较差。俄罗斯有很多地区的生活要远比远东地区的人们生活质量高得多。

第二，俄罗斯的太平洋地区一直与俄罗斯领土安全密不可分。

第三，俄罗斯的太平洋地区被认为是俄罗斯沉重的负担。因为想



发展这一地区，就需要投入很多的财政资源，而且它在地理位置上离俄罗斯的政治中心比较远。不仅如此，这个地区的面积特别大，发展起来比较困难。

## 二、俄罗斯远东地区融入亚太地区

### 1. 俄罗斯远东地区融入亚太地区的措施

总体来说，发展俄罗斯太平洋地区是俄罗斯融入亚太地区的必要条件之一。21 世纪初，俄罗斯总统对太平洋地区一直有两个观点，而这两个观点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个观点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不足阻碍了俄罗斯融入亚太。

第二个观点是，失去太平洋地区对整体俄罗斯领土安全的威胁。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这里我列出了两大类主要的措施：

第一类措施就是行政和政治资源。主要包括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颁布的各种国家法令（包括总统令），以及总统本人多次到太平洋地区去视察，以及像其他的控制当地的、国家垄断的影响等等。这一类是纯粹的行政手段，这也是在苏联时期比较惯用的一种手段。

第二类措施就是通过各类的专项纲要来实施发展规划，这里包括各种各样的联邦的，还有各个行业的发展规划、战略，以及各类的发展共享。到目前为止，此类文件一共有 30 多份。所有的这些发展纲要主要是为了解决三大问题：第一项就是该地区的综合发展。所谓的综合发展就是指整个广阔的太平洋地区，从海参崴一直到阿纳德尔这个广阔的地区，要同时发展。第二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稳定和增加当地的人口数量。第三项任务就是使太平洋地区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能够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也谈到，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在外贸结构上，更加倾向于亚洲地区。所以，莫斯科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一种向太平洋地区发展，向东发展的倾向有可能会威胁俄罗斯的领土完整。”

### 2. 俄罗斯远东地区融入亚太措施的成就

当然，所有的这些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为像其中的一些规划，落实得是非常积极的。首先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的建成。这个管道建成了之后，亚太地区在整个俄罗斯外贸中所占的比

重有所增加。还包括在海参崴筹备和举办的 2012 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专项发展规划。太平洋地区还有其他的建设项目，也确实是可以圈可点的。比如像远东地区的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

### 3. 仍需解决的问题和复杂变化

从总体上来看 21 世纪初所确立的任务中，有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还有了更加复杂的变化。

首先就是太平洋地区在经济上、技术上和生活水平上仍然落后于很多地区，落后于相邻的国家，当然朝鲜除外。而且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相比也是比不上的。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数据就是，尽管对滨海边疆区、海参崴和萨哈林岛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口数却在持续的减少。尽管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居民迁移，还有一些相应的国内人口流动的措施，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口还是在逐渐减少。这就是所有的这些措施效果有限的最有力证据。而且人口的流失是一方面，整个人口素质的下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从这个地区流失的都是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和有创新能力的人。而迁移来的主要是来自原中亚地区的教育水平有限、专业技能不高的人群。种种因素造成中央政府在当地的老百姓里的支持率是比较低的。

当然，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俄罗斯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央政府也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2013 年 10 月，梅德韦杰夫总理在政府远东发展的专项工作会议上讲了一些话，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告白：所有的方式，我们在最近几年采取的所有希望能够彻底地改变远东发展的面貌的办法和模式，都没有能够产生经济成效。

### 4. 俄罗斯远东地区融入亚太措施不力的原因

接下来自然要寻找措施不力的原因，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原因是距离。所谓的距离就是离莫斯科太远。

第二原因是气候。俄罗斯太平洋地区有 70% 的领土属于永久冻土地带。

第三个原因就是人口和劳动力的短缺。尽管实际上当地某些地区

的失业率达到 70%，但劳动力仍是短缺的。

第四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基础设施的不完备。这确实是一些现实存在的原因。如果分析一下整体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还是从欧洲的视角在看待这个问题。而且还是伴随着对俄罗斯太平洋地区会融入亚洲的情况的恐惧。包括从距离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说：离莫斯科太远了不好。但是离黑龙江很近的因素却没人提及。

接下来我想探讨一下发生这种状况的现实原因。

第一个现实原因就是自然的原因。首先，这个地区的范围太大。如果说发展整个地区的话，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平衡发展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另一个因素就是自然条件。而且目前俄罗斯太平洋地区的总人口也就只有 700 万，只有上海的一半左右。这些人口要在这么大的土地上生存，当然不可能在每个地方平均分配。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这些人到底住在那些地区呢？

第二条现实原因就是目标的设定并不合理。设定的目标不恰当，采用的手段也就应当被质疑的。在目标设定不合理方面，我主要是用了三个词：庞大性、悦众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庞大性：指整个这个大的地区全部要平均发展，并不是说发展几个方向或是有针对性的发展。悦众主义：指所有的政府要给老百姓承诺，“我们要发展各个地区”、“要为民谋福利”等这种论调来获取民众的支持。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所采取的积极的手段是不太符合现实的。当我们跟莫斯科的一些学者和官员也在争论“到底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政策呢？”我们远东的学者比较支持：首先要采取一些措施不使本地的居民进一步流失，要使得当地人留在当地，而不是离开俄罗斯太平洋地区；而中央的一些如莫斯科的一些官员他们认为就是应该把大批的人迁到他们的地区去，但是他们迁去 10 个人的同时，我们这边就流失 100 个人了，目前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第三个现实原因就是制定这些发展规划的决策者的情绪和专业水平。因为他们确定了这些政策，他们要还执行这些政策，基本上通过的所有这些规划都没有很好的落实。可以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30 多份当地的发展规划或者战略真正能够落到实处只有其中一个纲要，就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筹备和举办 2012 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即便这个纲要也

是因为总统本人亲自在督办才能够落实。这还是官方的评价，如果从非官方的角度来看，有的发展项目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启动。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俄罗斯岛上建了联邦大学，但是供水问题没有解决，直到今年才架起水管，解决供水问题。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一下，规划和落实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总统和总理也是非常清楚。

### 三、发展俄罗斯远东地区现阶段努力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从苏联时期一直到现在的俄罗斯，整个一个管理体制来看有一个惯性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政府都在寻找一些新的工具来落实这些任务，像在 2012 年就设定了远东发展部，去年通过远东地区 2018 年前发展规划，但是之前的规划方案不合适，又在重新修订。现在正在积极讨论的理念叫做“快速发展地区”，就在去年 12 月 12 日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又再次强调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振兴是俄罗斯 21 世纪国家优先方向。

所以从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层面的决策者和学者以及从地方层面的管理者和学者都在寻找比较合适的发展方式，中央政府的高层决策者之间又逐渐形成一个认识：所谓的发展这一个地区并不是简单的从这个地区开采出资源，再把资源出口。他们正在逐渐地、缓慢地、很艰难地认识到发展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前提在这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才能愿意到这里来。

#### 1. 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往的思维定式

所以说这里就要打破很多思维的定式，包括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对这一地区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概念。

其中的一种所谓的形成的思维定式是：太平洋地区就是俄罗斯融入亚洲的平台。什么是平台？就是一帮人冲过来，一顿糟蹋，跑过去落实任务去了。平台就是一个平台，并不是我们的领土。

第二种常见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是：俄罗斯远东地区就是欧洲地区的殖民地。意思就是给自己的宗主提供了资源，这个地方的作用就到此为止了。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包括俄罗斯的经济精英也逐渐认识到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不是俄罗斯的殖民地，而是俄罗斯国家的一部分，

和欧洲地区同样平等的俄罗斯国家的一部分。

第三种思维定式的错误认识，就是综合发展（全面发展），但是这所谓的全面发展不可能。我们所谓的太平洋发展应该创造适宜人居住的环境，然后才能推动它的经济合理发展。

第四种就是关于各种各样的国家发展纲要和规划，特别是经济发展规划。这些规划看起来更像苏联地区制定的国家计划，简单的说是一种什么规划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要造一个铁路，那个地方我们要盖一个棚子，这就完了。这些发展纲要，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条件，这是苏联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和顶层设计，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这些问题的根源正在慢慢的、逐步的为俄罗斯的政治学术和经济精英们所认识到。

## 2. 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需要对外合作

还有一点就是上面的精英阶层们逐步认识的一点：俄罗斯太平洋的发展必须大规模的依靠对外国际合作。首先，俄罗斯非常需要技术和投资的支持，尤其是来自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所以刚刚前面提到的最新的提法和理念叫“加快发展地区”，主要就是为了创造良好条件，从东北亚邻国吸收更多的投资和高新技术。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中国的作用毋庸置疑的。中国是俄罗斯发展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当然这里面在发展的对华的合作也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俄罗斯有远东后贝加尔经济发展规划，中国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当时说如果这两个计划能够找到结合点，然后就能共同的推进。但是这个计划推进的并不顺利，杨成老师对这个也很有研究的，在新加坡国际会议上还专门评估了这两个计划的对接和整个工作的量和规模。俄罗斯方面仅仅完成了 4%，是很少的，中国方面大概完成了 14%-15%的水平（不同来源统计数字不同）。我想如果在座各位有看过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的公告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发现，这两个规划并没有被提到。

其实在前天，5月20日签署的会晤公报里，有关于俄中经济合作很多相关的内容，我这里主要谈到太平洋地区远东有关项目。在公报里主要经济合作，一方面投资合作，包括从两国元首会晤过程和接受媒体采访透露的信息来看，中国要向俄罗斯投入的大量资金主要运用

于开采和加强能源资源。另一方面的合作，由中国投资来建设俄罗斯交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铁路，公路和港口建设（港口集中俄罗斯太平洋地区南部）。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域，俄中共同关切的，亚太有共同利益的经济利益的领域。首先是能源，公报中提出了天然气田和俄罗斯加大电力生产，向中国出口电力。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俄中在农业领域的合作也有巨大潜力挖掘，包括生态资源、联合打击犯罪还有人文领域合作，而且我还特意关注了下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因为在俄罗斯的远东还有非常巨大的学术潜力和科技发展的潜力，如果俄中两国的学术界能够在这方面加强合作的话，应该能够为这地区的发展献计献策。

#### 四、结论

首先，发展太平洋地区重要性在中央层面和太平洋层面是有共识的。

第二，目前这个地区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俄罗斯整体发展的共性问题。

第三，目前正在积极的寻求和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但是目前还无法充满信心地说：“探索的过程不会很长”，但是我们也是非常肯定的说：“工作和努力也在做，首先要和太平洋地区的邻国特别是中国加强合作。”

（责任编辑：张洪玉 华盾 孟舒）



## “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在伊拉克传媒战中的作用探析

### ——基于美国国家安全档案的解读

周鹤\*

**【摘要】**五角大楼将传媒战争作为对伊拉克战略信息战中的一部分,根据“信息法案”制定的白皮书与文稿简报创建“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先是根据国防部的战略规划,该传媒小组架起一座由萨达姆控制下的独裁垄断的伊拉克传媒通向美国力推的“伊拉克自由传媒”的“快速启动桥梁”,随后又制定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形象宣传”策略以发挥战争“好莱坞”的作用,对伊拉克传媒机构的报道内容和电视节目进行审核与控制,对抗“憎恶传媒”并配合联合部队对伊拉克的传媒进行整顿和打击,起着确保美国在向伊拉克民众宣传时控制伊拉克主要传媒机构的作用。但是,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复杂环境以及其本身缺少可供衡量评估的依据,“快速反应传媒小组”也存在着一一些明显的问题及负面效应。

**【关键词】**“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美国;伊拉克;传媒战争;国家安全档案

美国的伊拉克传媒战争是在伊拉克战争中一种重要的非战争军事斗争,是美国对伊战争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具有较高的战略地位和价值。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美国就发动了比以往更彻底的将宣传和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博士研究生。

新闻传媒纳入军事指挥结构的传媒战争。“快速反应传媒小组”（Rapid Reaction Media Team）便在这种情况下，肩负着筹备与开展对伊拉克的传媒战争的使命，由国防部的战略规划者设计并创立。“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由华盛顿部署，配合驻巴格达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执行任务。其小组成员均由美国政府“钦点”任命，负责审查与培训伊拉克的传媒人员、筹集所需的财力与物力、设计广播与出版概念规划、研究长途卫星管道的配备等。“快速反应传媒小组”所处的地位及肩负的使命，决定了其在美国对伊拉克的传媒战争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基于解密的美国家安全档案对“快速反应传媒小组”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与解读，以加深对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采用全方位作战战略的了解。

## 一、国防部成立“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的战略筹划

“9·11”恐怖袭击的发生，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和严峻的安全挑战，使美国认识到“即使凭借着海洋的保护，美国的国土也不会永远远离犹如阴云不散般的威胁。”<sup>①</sup>美国政府决定对恐怖主义采取“先发制人”、彻底反击的战略。

对于伊拉克，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认为“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萨达姆就是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麻烦。”<sup>②</sup>追溯于1984年的两伊战争，萨达姆“就开始对入侵的伊朗人与反对他的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致使成千上万的人在袭击中死亡。”<sup>③</sup>“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怀疑萨达姆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更是难以撇清关系。萨达姆狡猾奸诈，对美国已构成巨大的威胁。小布什说：“在谈到反恐战争时，我不能只谈到基地组织，还要谈到伊拉克。毕竟，萨达姆是持有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他惯于乐此不疲地使用对全世界进行欺骗的伎俩，并与恐怖分子网络

---

① Kathleen T. Rhem, “Powell to Present Intel on Iraq to U.N. Security Council,”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515>, accessed January 2, 2014.

② 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东西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13页。

③ Jim Garamone, “Just Who Is Saddam Hussein?”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547>, accessed January 3, 2014.



联系。他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他必须解除武装，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有一个彻底的交代。”<sup>①</sup>在联合国对伊拉克的核武器调查中，美国认为萨达姆故意使用拖延、欺骗的手段不配合，来掩藏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我们拥有大量有关萨达姆购买与持有生化武器的信息，但他却用拖延的手段来欺骗我们并否认我们已经弄清了藏匿生化武器的精确位置。因此，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萨达姆并不进行合作。”<sup>②</sup>“他要求更多的时间只是以便使其能够用更多的藉口来搪塞武器核查人员。他真正的兴趣是在广袤的乡村山地里玩捉迷藏。”<sup>③</sup>面对萨达姆的行为，美国宣告用和平方式解除萨达姆武装的尝试已经失败，在愈发不可收拾的威胁下，只有动用武力。因为“美国的人民、朋友、盟友是绝不可能在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和平的萨达姆流氓政权的仁慈下存活的”<sup>④</sup>，2003年3月19日，美国军队开始了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传媒相对于战争是一种符号暴力与躯体暴力之间的关系，是战争的“另一只手”。作为对军事战略与行动的宣传与渲染，传媒是战争意义与身份定位的重要力量。<sup>⑤</sup>要赢得这场打击恐怖主义的伊拉克战争，美国需要采取全方位作战的战略，使用传媒作为美国政府以及五角大楼对伊宣传的渠道，利用传媒可以产生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打一场在伊拉克战略信息战主导下的传媒战。为了有条不紊地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美国先于2002年年中成立了“特别规划办公室”，用于协调“任何非军事状况与政治方面的活动”。2003年1月，又分别由负责心理战与秘密入侵伊拉克的特别行动与低强度冲突办公室及近东与南亚事务（特别计划）办公室，依据“信息自由法案”的宗旨起草了一份白皮书与文稿简报。在这份文件中，国防部的战略规划者们首次提出了“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的概念，并提出创建“快速反应

① Jim Garamone, “Bush Pushes Threat Integration Center, Praises Intel Pros”,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423>, accessed December 5, 2013.

② Jim Garamone, “Rumsfeld: Only ‘Certainty’ on Iraq Is Saddam Not Cooperating”,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557>, accessed December 7, 2013.

③ Linda D. Kozaryn, “Bush Vows U.S. and Friends Will Disarm Saddam Hussein”,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549>, accessed December 8, 2013.

④ Rep. Henry A. Waxman, “About Iraq on the Record”, <http://oversight-archive.waxman.house.gov/IraqOnTheRecord>,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3.

⑤ James Pamment, “America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Iraq: The ‘Rapid Reaction Media Tea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Technologies*, Volume: 2, 2 April, 2012, p.14.

传媒小组”的建议，以使其作为由萨达姆控制下的独裁垄断的伊拉克传媒向美国力推的“伊拉克自由传媒”之间的桥梁。<sup>①</sup>文件还进一步地规划了“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的使命：“向伊拉克民众宣传美国政府以及临时联军权力机构为了稳定伊拉克而采取的行动和为了给伊拉克人民重建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而并肩努力的意图。”<sup>②</sup>对于“快速反应传媒小组”使命的终结也做出了大致的规划与构想，即必须在美国政府及联军临时权力机构认为由驻伊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完全控制了伊拉克的局势之后方能结束。为了使“快速反应传媒小组”主导美国对伊的传媒战，控制伊拉克的主要传媒机构，以确保美军在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快速反应传媒小组”需要着重在以下几方面充分发挥传媒的战争“好莱坞”作用：

首先，从思想源头上遏制恐怖主义，对萨达姆及其政权的邪恶本质进行深入揭露，获取对反恐战争的支持以及对伊战合法性的宣传。美国认为萨达姆是“危险狡诈的人，又拥有危险至极的武器，是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sup>③</sup>。他的“非法政权是以暴力和欺骗起家的，目前正全力武装地去对抗、威胁文明世界”，萨达姆必须“遵从世界的舆论，解除武装”。<sup>④</sup>“快速反应传媒小组”要对萨达姆及其随从以欺骗的手段，“制造惨案、利用伊斯兰教腐化政府机构，从政权中获利”的情况进行深入地揭露。目前已经确凿无疑的事实有“萨达姆刻意制造食物与药品短缺的局面，再把伊拉克人民蒙受的痛苦归咎于联合国的制裁与美国的打击。他指使传媒人员专门挑选出生病与营养不良的伊拉克儿童，在媒体及摄像机前面聚集、游行，以影响、扭转对其不利的国际舆论。”萨达姆本身并不十分笃信宗教，但他却以第三者的身份利用伊斯兰教去维护权力与控制伊拉克人民。“为了欺骗与利用虔诚的祈祷者的善意，萨达姆把他的画像在整个伊拉克范围内张贴。”萨达姆及其随从还以伊斯兰教的名义“从欲前往宗教圣地麦加与麦地那

---

①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raq: The Media War Plan, Doc. 1, White Paper "Rapid Reaction Media Team" Concept*, p.7.

② *Ibid.*, p.1.

③ Jim Garamone, "Just Who Is Saddam Hussein?"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 Article.aspx?ID=29547>, accessed January 12, 2014.

④ Linda D. Kozaryn, "Iraq Must Disarm; North Korea Must Honor Agreements, Bush Says,"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 Article.aspx?ID=29604>, accessed January 15, 2014.

朝圣的虔诚的伊拉克人民那里聚敛钱财”。除此之外，萨达姆政权还进行虚假宣传，“把拒绝联合国的决议描绘成是与非穆斯林世界企图围剿穆斯林的对抗”，“通过散布尽可能多的谎言来腐化政府机构，伪造文件、制造虚假的残暴场景在电视上播放，在报纸杂志上刊登。”<sup>①</sup>“快速反应传媒小组”通过揭露萨达姆政权制造的一系列骗局与虚假信息，要向全世界表明萨达姆对解除武装拖延得越久，他“这个独裁者无疑地就会越有机会依赖恐怖组织，包括与基地组织一起运送武器、共享技术和使用武器。”<sup>②</sup>在此种情况下，美国惧怕作为伊拉克独裁者的萨达姆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交给恐怖分子，而且已有许多关于生化武器或者核武器的威胁迹象流入白宫，不能“束手等待危险真正到来”，“要勇敢面对来自伊拉克的种种威胁”，<sup>③</sup>小布什总统迫不得已才“做出采用武力解除伊拉克的武装的明确选择”，<sup>④</sup>对伊拉克发动一场全面的反恐战争。

其次，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扩大西方民主政治在伊拉克的影响。在美国的眼中，萨达姆是“一个正在制造、隐藏其可以用来支配中东、恐吓文明世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sup>⑤</sup>铲除萨达姆，伊拉克人民才会“从镇压中获得自由，从酷刑中获得自由、从谋杀中获得自由，从邪恶中获得自由。”<sup>⑥</sup>“快速反应传媒小组”要对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过程中美国所奉行的理念、伊拉克人民所享有的民主政治进行宣传。由于“自由与民主不仅仅是西方的价值观，它也是穆斯林世界、亚洲的世界观，普世的价值观”<sup>⑦</sup>，因此美国要铲除的也就不仅

① Gerry J. Gilmore, “White House Report: Shifty Saddam Continues ‘Apparatus of Lies,’”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543>,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3.

② Kathleen T. Rhem, ell: “Time Running Out for Iraq to Disarm”,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528>, accessed December 15, 2013.

③ Ibid..

④ Kathleen T. Rhem, “Iraq’s Disarmament Inevitable, Defense Policymaker Says,”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 Article.aspx?ID=29527>, accessed January 10, 2014.

⑤ Jim Garamone, “Removing Hussein a Key to Regional. World Peace, Bush Says”,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 Article.aspx?ID=29380>, accessed January 12, 2014.

⑥ Linda D. Kozaryn, “Bush Vows U.S. and Friends Will Disarm Saddam Hussein”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549>, accessed January 15, 2014.

⑦ Rudi Williams, “Wolfowitz Talks to Iraqi Americans About Ousting Hussein, Rebuilding Homeland,”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396>, accessed December 8, 2013.

仅是萨达姆，而是社会复兴党及其用于镇压人民、维护统治的整个制度。因为“所有的社会复兴党成员都采用同样的受训方式，拥有与萨达姆一样癫狂的心态。他们对生活充满敌意，对人民施以酷刑，他们是杀人恶魔。”作为恐怖组织的一部分，他们更把“反人类、破坏人际关系、摧毁民主政治”作为目标，“禁止让伊拉克人民拥有自由，控制伊拉克人民，把伊拉克人民变成其可以为非作歹的奴隶”。他们就是“一个恶性肿瘤，如果美国现在不铲除，那么在5到10年内也必须得铲除。”<sup>①</sup>美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强大的、善良的、慷慨的、富有同情心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将领导世界走向和平，全世界的孩子将因此能在和平的社会中成长。”美国将珍视“伊拉克人民的生命与自由、确保伊拉克的领土完整，禁止对伊拉克油井的破坏。”<sup>②</sup>除此之外，美国也绝不会容忍“让一个残暴的统治者来取代另一个”，因此“伊拉克人民在新政府中将会拥有参与权，享有各种受到保护的权力”，他们“未来的任何状况都将比在萨达姆统治下的如同噩梦般的世界要好。”<sup>③</sup>而且，从长远来看，伊拉克将“在这一地区更有发展前途，其稚嫩的民主制度将是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典范。用一个服务于他们的政府来取代一个折磨和屠杀他们的政府，对伊拉克人民有益。”<sup>④</sup>赖斯在对战后的伊拉克的展望上说：“没有了萨达姆的统治，伊拉克将会拥有一个管理高效的民主政体。”伊拉克人民终将走上民主之路，获得更多的权益，得到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人类尊严：“有权选举国家的治理者，有权让子女享受免费教育，有权集会及言论自由。”这些就是美国锲而不舍坚持追求的价值所在，必须“让伊拉克人民知道美国不仅是一直站在权力与稳定的一侧，而且也立于价值观的一隅。对于伊拉克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从压迫中进行自我解救的千载难逢的良机。”<sup>⑤</sup>

---

① Rudi Williams, “Iraqi Justice: ‘My Lawyer Asked the Judge to Sentence Me to Death’”,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391>, accessed December 10, 2013.

② Linda D. Kozaryn, “Bush Vows U.S. and Friends Will Disarm Saddam Hussein,”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549>, accessed December 20, 2013.

③ Jim Garamone, “Removing Hussein a Key to Regional. World Peace, Bush Says”,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 Article.aspx?ID=29380>, accessed December 22, 2013.

④ 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第246页。

⑤ Linda D. Kozaryn, Rice: “No More Cheat and Retreat; Foresees a Democratic Post-

第三，稳定伊拉克民情以及宣传美国的人道主义措施，避免伊拉克内部的混乱。在解除萨达姆的武装和解放伊拉克的战争中，美国面临着伊拉克人民对战争结果的担忧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疑虑。“快速反应传媒小组”要担负起美国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援，援助伊拉克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重建与发展”<sup>①</sup>的宣传，尤其是对伊拉克的具体政策，把重点放在美国高层的演讲与公开谈话上，以化解不利于美国的负面影响。小布什在消除伊拉克人民对未来的疑虑的讲话上说：“勇敢与备受压迫的伊拉克人民，推翻萨达姆政权之日即是你们的解放之日。”<sup>②</sup>“伊拉克人民的真正敌人是萨达姆·侯赛因，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把伊拉克人民用作人肉炸弹，对其遭受的痛苦和奴役没有丝毫的怜悯与同情。美国则是带着一颗悲悯之心的，把伊拉克人民看作是在长期的残暴统治下遭受不堪之痛苦、需要救赎的人们。”“伊拉克人民可以确信这一点：美国将会帮助你们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一旦冲突发生，我们将会给你们带来食物、医药及日常用品，最重要的是将给你们带来自由。”<sup>③</sup>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市政厅的会议上说：“当萨达姆与他的政权成为历史烟云时，美国将竭力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一个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伊拉克。”“我再次向你们担保美国是致力于解放伊拉克人民，而不是占领伊拉克。”“美军只在必要时才在伊拉克驻留，完成使命后会立即撤离。”<sup>④</sup>作为国务卿的赖斯说：“美国致力于保护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同时确保伊拉克的宗派暴力冲突事件不再大规模地发生。”“尽管美国还无法确切知道建立属于伊拉克人民自己的民主政府需要多少时日，但是美国绝对做好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准备。”“美国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全力为伊拉克与邻国的相处创造稳定与和平的环境，为伊拉克民主政

---

Saddam Iraq,”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453>, accessed December 25, 2013.

① The Honorable J. Dennis Hastert,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20515, Washington, March 25, 2003.

② Jim Garamone, “Bush Says Trusting Saddam ‘Not a Strategy’, ‘Not an Option’”,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519>, accessed December 25, 2013.

③ Kathleen T. Rhem, “Bush: U.S. Will Do What It Can to Protect Iraqi Lives”,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448>, accessed December 20, 2013.

④ “Town Hall Meeting with Iraqi-American Community”,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339>, accessed December 23, 2013.

治的发展铺平道路。”<sup>①</sup>国防部副部长在国会山的演讲中说：“美国迫切地希望解放伊拉克而不是占领伊拉克。伊拉克是属于伊拉克人民的，而不是属于美国、联军或其他任何组织与机构的。”“美国不会在军事行动后，把混乱的残局抛给伊拉克人民独自收拾，这是对伊拉克、美国和世界都极不负责任的行为。”<sup>②</sup>国防部长副助理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防部已同国际救援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同盟机构一起合作，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尽快地到达那些亟需的伊拉克人民手中。”“国防部的目标是减少伊拉克人民的流离失所，降低基础设施的损坏，尽全力避免公共服务的中断，美国将会为战争冲突中的伊拉克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协助伊拉克完成随后的重建工作。”<sup>③</sup>

## 二、“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的构成与实际作用

“快速反应传媒小组”作为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中传媒战的关键组成部分和重建与人道主义救援办公室传媒发展部组建的伊拉克传媒网络公司（Iraq Media Network）的核心部分，肩负着在后萨达姆时代架起一座由独裁垄断的伊拉克传媒到美国力推的“伊拉克自由传媒”之间的“快速启动桥梁”、构建伊拉克自由传媒并把它作为中东地区的传媒范本的使命，起着确保美国在向伊拉克民众进行宣传时控制伊拉克主要传媒机构的作用。

首先，“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制定美国在伊拉克争战中的“形象宣传”策略，发挥战争“好莱坞”的作用。根据国防部白皮书对“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的职能规划，在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时，必须要确保向伊拉克人民宣传美国的“正面形象”。对于在伊拉克的负责“传媒战争”的传媒专家团队，“快速反应传媒小组”规划了四个方面的人员构成。第一，美国政府的传媒专家团队，成员主要为由

---

① Linda D. Kozaryn, Rice, “No More Cheat and Retreat; Foresees a Democratic Post-Saddam Iraq”,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453>, accessed December 25, 2013.

② Linda D. Kozaryn, “U.S., Coalition Plan to Restore Post-War Iraq”,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29440>, accessed December 28, 2013.

③ Jim Garamone, “Working to Prevent Humanitarian Disaster in Iraq”,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 Article.aspx? ID=29383>, accessed January 22, 2014.

美国“钦点”的电视、广播和报纸方面的专家，通信建筑专家以及负责培训的专员组成的复合小组，还包括进行全职工作的若干美国政府官员与政府指派的国防承包商人员，负责执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的传媒战争计划；第二，英国的传媒专家团队，由伊拉克裔的英国公民组成，作为美国传媒专家团队的补充，协助美国的传媒专家团队，向伊拉克人提供有关美国的意图与行动的信息，在给伊拉克人民描绘未来的希望时阻止伊拉克的“分化”；第三，伊拉克传媒专家团队，成员为由美国政府“钦点”并审核通过的伊拉克传媒专家，他们作为美国政府的“形象脸面工程”一方面为美国传媒专家小组提供在节目编排上的本土化的指导，另一方面协助美国传媒专家小组甄选及培训伊拉克传媒主播与出版印刷人员。第四，非政府组织、智库顾问的传媒专家成员，主要由兼职人员组成，负责弥补在节目审核与监管上的缺陷与不足，同时并由其进行采编、开发新闻和娱乐节目的内容。<sup>①</sup>

在对伊拉克“传媒战争”的具体执行策略上，“快速反应传媒小组”通过使用传媒手段来扩大、深化战争，将军事力量转移到传媒通讯领域，把军事统治转向思想统治，通过军事力量与传媒行业不同方面的结构链接，将实质性的入侵与象征性的思想传播捆绑在一起。<sup>②</sup>最终，在“快速反应传媒小组”掌控下的伊拉克传媒广播网，拥有了一个二十四小时持续播放的卫星新闻频道、两个地面电台频道、两个广播频道、一份向全国发行的报纸以及地区传媒制作设施。<sup>③</sup>通过所控制的伊拉克传媒广播网，“快速反应传媒小组”提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编的五角大楼的规划者热衷于看到的对美国有利的新闻，尤其是对武力入侵进行美化，来引导伊拉克人民接受与认可美国所传播的信息与内容，以起到对伊拉克人民产生深远的心理作用与政治影响的效果。

其次，“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对伊拉克传媒机构的报道内容和电视节目进行审核与控制。“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的成员由美国、英国的传媒专家以及“钦点”的伊拉克传媒专家组成。根据五角大楼的规划，在美国政府制定的为期 1-2 年的战略信息运动中，需协助伊拉克的

①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raq: The Media War Plan, Doc. 1, White Paper "Rapid Reaction Media Team" Concept*, pp.1-2.

② James Pamment, p.9.

③ Ibid..

民间军事力量向广泛的代议政府进行过渡。由于伊拉克存有许多相当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憎恶传媒”（hate media），“快速反应传媒小组”通过运用策划、运营、操控新闻、报纸、电台、电视、互联网等传媒手段，致力于在伊拉克创建一个相当于 BBC（英国广播公司）或 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融洽与公正”的公共服务电视广播公司，以对伊拉克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华盛顿的部署下，“快速反应传媒小组”与任命于巴格达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官配合，对伊拉克“新闻、杂志的审核”执行高于“好莱坞”新闻的原则，禁止报道与“伊拉克内部分裂有关的内容”，着重刊登“什叶派、逊尼派与库尔德派的新闻”。<sup>①</sup>2003年5月15日，“快速反应传媒小组”与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AIC）耗费5万美元创办《萨巴赫报纸》（Newspaper as-Sabah），用以协助国防部完成“通过建立美国的存在及控制基本问题来平息在伊拉克人中所产生的动荡”的目标。2003年6月10日，在伊拉克“禁止进行的传媒活动”的14号令中明确规定传媒机构不准播放或出版以下内容：“煽动针对任何个人与群体的暴行，包括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群体的以及妇女的；煽动市民骚乱，抢劫或破坏财产；煽动针对联军部队或者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暴行。”<sup>②</sup>

在电视广播节目上，“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的任务是向伊拉克人民“控告旧政权的累累罪行，宣传光辉灿烂的新未来”，对原有节目进行甄别、整顿与重新设计、编排，在主题框架下制作新节目，通过主题节目来宣传美国的政策。为了宣传民主政治的内容，“快速反应传媒小组”选用经过“审查的”、具有英国国籍或美国国籍的伊拉克人作为节目的“形象代言人”，以起到在由美国控制的伊拉克电视频道上“向同为伊拉克人的民众进行新闻报道或宣传时，比联军的记者或主持人在心理上更容易产生使人信任的良好效果。”<sup>③</sup>不仅如此，“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对节目的主题与播出时间也作出了详细规定，按日、周、月播出的政治宣传类主题节目主要为瓦解社会复兴党

---

① James Pamment, p.2.

② Ahmed K Al-Rawi, “The US influence in shaping Iraq’s sectarian medi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13, 75(4), p.375.

③ *Ibid.*, p.381.



(De-Baathification)、近期历史讲解(如:“萨达姆大叔”、历史频道的“萨达姆的炸弹制造者”、“杀戮场”等)、由美国政府审核通过的“民主系列节目”、环保(沼泽地、补水)、防雷宣传、重新启动石油项目、司法与法律议题的规则、战犯与真相委员会等。娱乐与新闻节目主要为好莱坞、新闻网、阿拉伯国家捐款、体育等方面。<sup>①</sup>在互联网节目上,播放的主题主要为人道主义援助、公共服务、对难民的照顾与管理等,以连续不断的滚动方式播出。<sup>②</sup>

第三,协助联军对抗伊拉克“憎恶传媒”,配合执行整顿的任务。由于伊拉克联军临时权力机构把对伊拉克的传媒管制视为“军事必要”,美国官员对在伊拉克的任何“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都有所恐惧,<sup>③</sup>因此采取了对任何威胁伊拉克传媒战略的行为都坚决予以打击的策略。在华盛顿的部署下,“快速反应传媒小组”肩负起协助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对抗伊拉克“憎恶传媒”的任务。首先,协助制定了整治伊拉克“憎恶传媒”的具体策略,以重建可以作为阿拉伯世界自由传媒典范的伊拉克本土传媒。2003年6月,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作为重建与人道主义救援办公室的继任者签发了第6号命令,宣布由“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组建的“伊拉克传媒网络公司”正式作为在伊拉克过渡时期的传媒机构,取代于5月份被占领当局取缔的伊拉克新闻部。<sup>④</sup>“伊拉克传媒网络公司”解雇了5000多名原伊拉克新闻部的员工,仅留用了极少数的员工及传媒器材与设施。2003年9月23日,禁止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与阿拉伯电视台等主要电视台播放有关美国政府部门与联军行动的节目。<sup>⑤</sup>

其次,“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协助美国“临时传媒特派员”拆除并严厉打击伊拉克的“憎恶媒体”。根据华盛顿的部署,“快速反应传媒小组”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协助:高效评估仍存在的通讯建筑的威胁程度,以鉴别并控制在乌代·侯赛因控制下的所有传媒;充当翻译人员及操作传媒播控设备;建立巴格达的地方新闻局与特约通讯员中心;

<sup>①</sup>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raq: The Media War Plan, Doc. 1, White Paper “Rapid Reaction Media Team” Concept*, p.2.

<sup>②</sup> Ahmed K Al-Rawi, p.381.

<sup>③</sup> *Ibid.*, p.376.

<sup>④</sup> James Pamment, p.11.

<sup>⑤</sup> *Ibid.*.

配合执行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命令、传媒与民政方面的交叉任务；根据要求评估节目的播出效果并加以调整；采访政治犯与报道暴力活动；曝光萨达姆的宅邸及其所拥有的大量财富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解除。<sup>①</sup>在“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的协助下，第一个被关闭的“憎恶媒体”是伊拉克的广播台“巴格达之声”（Sawt Baghdad），随后又取缔了伊拉克的报纸《国家回声》（Sada al-Uma）、《独立报》（Al-Mustaqila Newspaper）、《穆克塔达萨德尔报》（Muqtada Sadr's newspaper）及《巴格达独立报》（Al-Mada）。此外，“快速反应传媒小组”还协助“临时传媒特派员”对报道伊拉克正面新闻的传媒进行资助，并秘密收买一些报纸刊登有利于美国的宣传文章与新闻报道。<sup>②</sup>

再次，“快速反应传媒小组”配合联军对伊拉克的“憎恶传媒”人员及设施进行武力打击。在伊拉克的战争阴霾隐约扩大时，美国就进行了“随军记者”（“Embedded Reporters”）计划，五角大楼规定这些“随军记者”必须在“随军训练营”接受相关训练并与士兵相处培养感情，以军方的立场对战争进行报道。因此，“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又肩负起配合联军对那些在伊拉克进行独立报道的“憎恶传媒”的人员与设施进行武力打击的任务。根据解密的伊拉克传媒战争大事年表显示，在“快速传媒行动小组”的配合下，以美英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在战争期间对在伊拉克的所谓的“憎恶传媒”人员及设施实行严厉、频繁的军事打击，致使多名传媒人员伤亡、多个传媒设施被摧毁。<sup>③</sup>尤其是对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巴格达办事处的阿拉伯卫星频道进行的袭击和摧毁，并逮捕了几乎所有在伊拉克进行报道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sup>④</sup>

---

①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raq: The Media War Plan, Doc. 1, White Paper “Rapid Reaction Media Team” Concept*, p.3.

② James Pamment, p.12.

③ Joyce Battle edited, “Iraq Media Timelin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19*, Posted on May 8, 2007,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219/index.htm>, accessed January 25, 2014.

④ Lindner, Andrew M, “Controlling the Media in Iraq”, <http://search.proquest.com.ezproxy.cul.columbia.edu/docview/61754643?accountid=10226>, accessed January 22, 2014.

### 三、“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在伊拉克传媒战中的效用 评估

“快速反应传媒小组”作为伊拉克传媒战争中的一部分，尽管在宣传美国的“战争形象”、控制伊拉克传媒机构的新闻报道与节目审核、协助打击伊拉克“憎恶传媒”等方面都发挥了有利于美国的作用，如驻基尔库克（Kirkuk）的美国大使馆负责人安·波定（Ann Bodine）在祝贺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的仪式上所说：“‘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在协助重建一个民主、联邦、多元、统一的伊拉克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sup>①</sup>但其在美国对伊传媒战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及负面效应。

首先，“快速反应传媒小组”耗费巨资，占用了数额不菲的国防开支，但最终结果却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五角大楼在入侵伊拉克前就投向对伊拉克传媒战的准备中，决定由“快速反应传媒小组”承担多项重要的任务：确定与审查美、英及伊拉克的“传媒专家小组”，获取资金、办公地点、设备、进行差旅预算，装备传媒播放小组，对出版小组、新闻处、广播网特约记者、技术小组进行培训，设计广播与出版概念方案，甄别并获得现有节目的支配权，对一些被“搁浅”的电视节目重新进行制作及编排，设计快速启动传媒建筑，根据命令向巴格达部署工作团队并执行任务等。<sup>②</sup>因此，在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前两个月，由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领导的特别计划办公室就为“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在伊拉克一至两年的行动划拨了 5.1 亿美金，从以下的两个方面的花费便可见巨额耗资之一斑。

一是花费 200 万美元作为“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开展为期 6 个月的人工成本与设备运营费用，且不包括编排节目的费用以及技术基础设施的费用，各项具体内容如下：

<sup>①</sup> Peter W. Galbraith, “Iraq: Bush’s Islamic Republic”,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5/aug/11/iraq-bushs-islamic-republic/>, accessed January 28, 2014.

<sup>②</sup>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raq: The Media War Plan, Doc. 1, White Paper “Rapid Reaction Media Team” Concept*, pp.2-3.

表 1 人工成本

	内容	金额（美元）	
1	美派驻 6 位伊拉克传媒顾问	800,000	
2	2 位美国传媒顾问	280,000	
3	若干美国政府特派员	暂未作记入	
4	10 位特约通讯员	100,000	
预算总计		1,180,000	

注：表格内容根据五角大楼的“快速反应传媒小组”概念白皮书整理。

表 2 设备运营费用

	内容	金额（美元）
1	电脑、打印机与图像处理软件	30,000
2	特约通讯员小组使用设备	80,000
3	租赁办公地点、通讯费与公共事业费	60,000
4	相机和视频、音频编辑组件	150,000
5	演播室与行政办公用品	30,000
6	差旅费（按日计算）	200,000
7	其他运营费用	270,000
预算总计		820,000

注：表格内容根据五角大楼的“快速反应传媒小组”概念白皮书整理。

二是花费 4900 万美元用于“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创建无线电台、电视台等传媒技术设施，具体内容详见下表：

表 3 创建无线电台费用

	内容	预算金额（美元）
1	信号传送器、演播室等	2,000,000
2	12 个月的营业费用	9,000,000
预算总计		11,000,000

注：表格内容根据五角大楼的“快速反应传媒小组”概念白皮书整理。

表 4 创建电视台费用

	内容	预算金额 (美元)
1	信号传送器、演播室等	3,000,000
2	12 个月的营业费用	25,000,000
3	微波链接和中继器	10,000,000
预算总计		38,000,000

注：表格内容根据五角大楼的“快速反应传媒小组”概念白皮书整理。

从以上表格中的内容可以看出“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在资金运用上的情况与数额，但由其建立的用以控制伊拉克信息传播的“伊拉克传媒网络公司”的实际运营状况与预期目标之间却相差甚远。尽管“伊拉克传媒网络公司”以每月 400 万美元的运营费用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政府传媒项目，但其严重缺乏运营资金的程度还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甚至无钱用于购买充足的摄像机电池、三脚架、剪辑设备等这样基本的传媒器材。<sup>①</sup>据 2003 年 11 月 12 日《乡村之声》上的民意调查显示，67% 的伊拉克人更喜欢阿拉伯电视台或半岛电视台的节目，而不是由“快速反应传媒小组”主导下的“伊拉克传媒网络公司”的节目。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根据前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承包商与“伊拉克传媒网络公司”的高级顾问唐·北 (Don North) 的分析，是任职的高层官员并不具备扎实的传媒从业经验，导致公司的运营政策及计划如走马灯似的不停变化；对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新闻会议及访谈内容进行滚动式播放，而对采写于街头巷尾的真正新闻却无暇顾及。<sup>②</sup>

第二，在宣传美国正面形象的过程中，存在对伊拉克原有传媒机构进行节目垄断、打击过于严厉，为进行正面的美国宣传存在收买、贿赂等不正当手段，遭到了伊拉克人民的反感，抹黑了美国的形象。首先，2003 年 9 月 23 日，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禁止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与阿拉伯电视台” (Al-Jazeera & Al-Arabiya) 等主要电视台播放有关政府部门与联军行动的节目。2004 年 4 月，“快速反

<sup>①</sup> James Pamment, p.12.

<sup>②</sup> Ibid..

应传媒小组”认为伊拉克原有的两个最受欢迎的传媒机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与美国主导下的“由伊拉克人民所掌控的为伊拉克人民服务的”电视台展开激烈角逐的目的是进行“可恶宣传”（Hateful Propaganda）。<sup>①</sup>在9月，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便闯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巴格达办事处，对其进行严格搜查随后开始无限期关闭。<sup>②</sup>

其次，在五角大楼的授权下，“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对报道伊拉克正面新闻的传媒机构进行资助，并秘密收买一些报纸刊登有利于美国的宣传文章与新闻报道。据2005年11月30日《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美国正在秘密地给《伊拉克报》一笔钱，以刊登使美国驻伊拉克特派专员的形象光辉伟岸的新闻。”这项交易是由林肯集团（Lincoln Group）出面操作完成的，“目的是对美国的行为及企图加以掩饰和隐藏”。<sup>③</sup>据2005年12月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认为五角大楼授权“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秘密地给伊拉克传媒钱财以刊登亲美新闻是错误的行为，会暗中破坏美国的可信度，应立即停止。<sup>④</sup>一些接受民意调查的受访者表示，对“快速反应传媒小组”出钱收买报纸去刊登美国的正面新闻报道的做法是感到失望的。

第三，对在伊拉克的非“随军记者”管控和打击过于严厉，使其终日惶恐不安，致使新闻自由急剧下降，伊拉克被无国界记者组织称为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相对于美国与联合部队的“随军记者”在战争前线以军方的视角进行正面的战争报道，如美国大兵的骁勇善战以及思乡之情，非“随军记者”大多进行的是对美国及战争不利的负面报道。<sup>⑤</sup>根据解密的伊拉克传媒战争大事年表，在“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的指导配合下，以英美军队为主的联合部队在战争期间对伊拉克的非“随军记者”等传媒人员及设施实施严厉的管控和打击，

---

① James Pamment, p.12.

② Joyce Battle edited, “Iraq Media Timelin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19*, Posted on May 8, 2007,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219/index.htm>, accessed January 20, 2014.

③ Joyce Battle edited, “Iraq Media Timelin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19*, Posted on May 8, 2007,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219/index.htm>, accessed January 20, 2014.

④ Ibid..

⑤ Andrew M. Lindner, “Controlling the media in Iraq”,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ntexts*, 2008, Vol. 7, No. 2, p.33.

仅在战争爆发的 2003 年就有 9 次，多名记者及传媒人员伤亡、多个传媒设施被摧毁。

第一次军事打击始于 2003 年 3 月 29 日，打击的对象是正在巴士拉（Basra）拍摄食物发放情况的四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进行开枪袭击的为英国的坦克。第二天，美国的武装力量随即用巡航导弹击中伊拉克的情报部，致使楼宇被破坏、卫星被摧毁。4 月 6 日，美军对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车队进行轰炸，BBC 的翻译阿卜杜勒·拉扎克死亡。次日，美军又向巴格达附近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带有明显“新闻”标识的车辆开火。第三天，美军坦克向巴格达的巴勒斯坦饭店开火，路透社的摄影师塔拉斯·茨尤克与西班牙第五电视台的摄影师何塞·库索被害。当日，美军又发射一枚导弹击中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巴格达分社，记者塔里克·阿布尤丧命。进行导弹袭击的原因是五角大楼听取了大量有关在巴格达分社四周布满写有“TV”的栅栏的报告。8 月 17 日，美国士兵杀死了一个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外拍摄的路透社的巴勒斯坦记者马赞·丹纳。9 月 24 日，美国士兵向 AP 的摄影师卡里姆·卡济姆和其司机卡西姆·赛义迪开火，并用机枪扫射其带有明显的“新闻”标识的车辆，记者因极度恐慌从车上跳下而逃过死亡。11 月 3 日，美军在贝库巴附近逮捕了正在对路边炸弹袭击的目击者进行采访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摄影师萨拉赫·哈桑，并将其带到了美国军事基地，然后又转至阿布·格莱布监狱。<sup>①</sup>

在多名非“随军记者”等传媒人员于战火中被杀害的同时，由于报道了美军对伊拉克平民的攻击以及伊拉克对美军占领行为的抵抗，在伊的非“随军记者”又被驱逐、逮捕和取缔新闻报道。<sup>②</sup>此外，对非“随军记者”的打击和处罚还被作为一种军事行为的交易。在费卢杰（Fallujah）的停战协议谈判中，美军就明确要求当地的领导人驱逐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并以此作为停战协议的一部分。<sup>③</sup>许多非“随军记者”因害怕在街道上被紧张不安的美军射杀而躲进旅馆，不敢随

<sup>①</sup> Joyce Battle edited, “Iraq Media Timelin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19*, Posted on May 8, 2007,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219/index.htm>, accessed January 20, 2014.

<sup>②</sup> Dahr Jamail and Ali al-Fadhily, “IRAQ: Media Under Growing Siege”, <http://search.proquest.com.ezproxy.cul.columbia.edu/docview/192341767>, accessed January 28, 2014.

<sup>③</sup> Ibid..

意出门。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从2003年3月美军开始对伊拉克的占领后，至少有94名记者、45名传媒助理人员死亡，至少38名记者被绑架。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监察结果也显示，美军入侵后的伊拉克新闻自由在所列的168个国家中已由2002年的130位下降到2006年的154位，仅比垫底的朝鲜稍微靠前一点。<sup>①</sup>

## 四、结语

“快速反应传媒小组”作为五角大楼部署的美国对伊拉克的传媒战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架起一座由萨达姆控制下的独裁垄断的伊拉克传媒通向美国力推的“伊拉克自由传媒”的“快速启动桥梁”，制定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形象宣传”策略，发挥战争“好莱坞”的作用，对伊拉克传媒机构的报道内容和电视节目进行审核与控制，对抗“憎恶传媒”并配合联合部队对伊拉克的传媒进行整顿和打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伊拉克战争状况复杂、持久，致使美国政府及联军临时权力机构认为一时无法达到驻伊美国中央司令部完全控制伊拉克局势的目标，“快速反应传媒小组”的使命和任务也因此在美国的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时才得以最终宣告结束。此外，又由于其存在对伊拉克地区传媒状况缺乏了解、新闻专业职能缺失以及本身缺少可供衡量评估的依据等问题，一方面由“快速反应传媒小组”控制的“伊拉克传媒网络公司”沦为了美国政府的宣传羽翼，遭到记者保护委员会与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强烈谴责；另一方面，在“快速反应传媒小组”主导下的伊拉克传媒与五角大楼的最终目标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它并未成为伊拉克与整个穆斯林世界传媒的航标灯，也没有成为对抗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宣传自由民主最有力的武器。

（责任编辑：李括）

---

<sup>①</sup> Dahr Jamail and Ali al-Fadhily, “IRAQ: Media Under Growing Siege”, <http://search.proquest.com.ezproxy.cul.columbia.edu/docview/192341767>, accessed January 28, 2014.



# 自治、族群-区域联邦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

## ——南奥塞梯分离的发生学

孙超\*

**【摘要】** 自 2008 年俄格战争爆发以来,南奥塞梯问题就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作为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南奥塞梯不仅牵涉到国内的民族问题,更牵涉到国际伦理规范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等诸多问题。本文将以南奥塞梯的分离作为分析的核心,仔细探讨南奥塞梯分离的由来。本文主要涉及三大块内容:第一部分思考南奥塞梯“自治”内涵,通过对政治自治和行政自治的区分,探讨南奥塞梯分离之源;第二大块内容,则运用族群-区域联邦主义视角,探讨南奥塞梯分离种子的孕育;最后一部分则使用族群-民族主义工具思考南奥塞梯分离出现,正是冷战后。分离将作为南奥塞梯政治现状而长期存在,南奥塞梯存在独立的潜在风险。

**【关键词】** 南奥塞梯;分离;自治;族群-区域联邦主义;族群-民族主义

南奥塞梯的分离是如何出现的?如果仅仅从地缘-历史因素解释就会陷入某种特殊论的藩篱。但是为什么其周围的高加索诸多民族却没有形成分离运动?南奥塞梯的分离首先是从苏联时代自治开始的。自治给南奥塞梯带来了什么?苏联的民族政策给南奥塞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苏联解体后这种影响又如何发生影响到南奥塞梯的分离?本文从三个视角:自治(autonomy)、族群-区域联邦主义(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和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出发探讨苏联时代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制度如何改变南奥塞梯的自治理念,探讨其在苏联解体后为何急于寻求独立,并思考后冷战时代南奥塞梯分离的发生机制。本文共分四节:第一节解释作为一种制度概念的苏联自治内涵,结合民族原则等探讨其机理;第二节简要分析苏联时代的政治制度,诠释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族群-区域联邦主义的概念，阐释其对苏联统一内在的破坏性；第三节概述苏联解体和解体后战争给南奥塞梯带来的巨大政治冲击，而这种冲击鼓励南奥塞梯的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而促进分离的发展；最后一节进行总结。

## 一、自治、苏联社会主义与民族

布尔什维克政权在革命取得胜利的立国之时就面临三个问题：1、如何继承沙俄帝国遗留下来的多民族遗产；2、如何恢复和重建一个历经战乱、暴力和血腥的国家，重新组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强大国家；3、如何为新生的苏联政权赢得国内外的合法性。列宁在1917年《国家与革命》中开篇就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剥削最压迫人民的工具。<sup>①</sup>无产阶级需要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要打碎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公社、取消议会制，组织起民族的统一，最终消灭国家。<sup>②</sup>在列宁看来，发动暴力革命取得国家政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列宁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来看待民族问题，这种立场使列宁在革命初期将民族与工人运动、暴力革命结合起来。他赞同“只有像高加索那样长久而成功地把各族工人完全统一起来（在各地，自下而上），才符合工人运动利益与任务”，反对“崩得式的分离主义者”。<sup>③</sup>他又同时站在民主立场上，承认“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不得享有特权！对少数民族不能有丝毫的压制和不公平”。<sup>④</sup>列宁完全打破了“民族主义者”的思考范式，用国际主义的思想将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sup>⑤</sup>

“民族自决”成为列宁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指针。在1913年著名

---

① [俄]列宁：“论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4页。

② [俄]列宁：“论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1卷，第25-51页。

③ [俄]列宁：“俄国的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的分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107页。

④ [俄]列宁：“工人阶级与民族问题”，《列宁全集》第23卷，第139-140页。

⑤ [俄]列宁：“关于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支持取消派的代表会议和取消派的组织委员会的问题”，《列宁全集》第23卷，213-127页。

的“民族问题提纲”上，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各民族普遍的享有“广泛的自我管理和自治，其机构应在普遍平等，无记名的投票基础上建立起来。”<sup>①</sup>但同时列宁反对“民族文化（民族）自治”这个口号，因为第一，它根本违反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第二，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第三，会将整个国家彻底民主改造任务于不顾。<sup>②</sup>

列宁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阶级斗争的思想，剥离了沙皇时代多民族国家治理的乱象和缺陷，将民族、国家、合法性等诸多分析要素全部都归到“国际主义”中去，而自治在列宁的概念里更多的是体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的一种表征，而不是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因此，自治更多表现出是一种区域性的、行政性的政治安排，而不带有一种民族性、独立性的内容。所以，社会主义自治的概念并不具有资本主义自治概念所包涵的“差异”内涵。而民族主义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公社和口号。<sup>③</sup>

布尔什维克对自治的理解也表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设上，而高加索则作为苏联大家庭的一员，也很自然地享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随着布尔什维克在高加索取得内战绝对性胜利，布尔什维克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方法试图将高加索从封建时代跳跃进入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了将伟大的社会主义实现，布尔什维克在高加索设置自治国家区（autonomous national districts），1918年3月成立鞑靼-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Tatar-Bashkir Soviet Republic）。<sup>④</sup>这种范例后来延伸至高加索地区。

但可惜的是列宁的自治理念并没有严格地贯彻到苏联政治设计中去。布尔什维克另一领袖斯大林对自治却有着自己的理解。1918年斯大林在鞑靼-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上讲话<sup>⑤</sup>：

① [俄]列宁：“民族问题提纲”，《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2页。

② 同上。

③ [俄]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列宁全集》第23卷，第472页。

④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The Great Challenge. Nationalities and the Bolshevik State, 1917-1930*.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2, p. 92.

⑤ [俄]斯大林：“在鞑靼-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5月10日到16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9到83页。

“至于其他区域，它们的劳动人民在民族运动的问题上是有些消极的。他们越消极，资产阶级表现得越积极。几乎在所有的区域内都建立资产阶级自治团体，它们组成‘民族委员会’……把自己变成了民族斗争和沙文主义的舞台。这些自治团体（我指的是鞑靼、巴什基尔……格鲁吉亚……）都追求一个目的：获得自治，使中央政权不再干涉它。……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自治，要求对自治区内‘自己的’劳动者实行全权统治的资产者所追求的自治。”

斯大林将自治视为资产阶级的追求的“分离”活动，是脱离中央政权的干涉行径。斯大林点名批评了南高加索带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反革命分子”，形成反苏维埃的同盟，苏维埃的士兵们革命的开进第弗利斯，但南高加索的行政委员会以及“民族议会”的反革命同盟需要被拔掉。<sup>①</sup>为了将这些革命士兵包括哥萨克从“沙皇的将军与富豪的压迫下解放出来”。<sup>②</sup>斯大林在1920年12月成立自治的山民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将北奥赛梯和南奥塞梯首次区分开来，同时更规定了自治的两大方面：

“自治有各种各样的：有像卡列里亚人，切列米斯人……所实行的行政自治，也有像巴什基尔人……实行的政治自治。山民共和国是政治自治，当然也是苏维埃自治。它将产生人民委员会，它和莫斯科直接联系共和国的经费从联邦共和国经费中支出。……对外贸易和外交事务完全由中央政权掌管<sup>③</sup>。”

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自治就是学会用你们自己的脚走路”。<sup>④</sup>斯大林的自治观念随时仿照列宁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要求做出的，但却带有浓厚的道德意识。自治作为一种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革命组织，具有至高的价值。而将自治划分为行政自治和政治自治则更是将自治的概念细化得更为精确。这种自治观念给南高加索带来三个可能的结果：

---

① [俄]斯大林：“戴着社会主义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47-61页。

② [俄]斯大林：“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1920年11月17日）”，《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52-358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1、将单一族群与固定区域连接起来，用行政手段划定范围会造成“有名无实”的区域大量存在。由于苏联特别是高加索地区多民族特点。政治自治和行政自治都是将单一族群作为统和的重要指标，但高加索地区各民族没有达到聚合性很强状况，使用行政指令划分进行自治只会将复杂多样的民族矛盾掩藏起来，强化发展固有的民族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社会关系。<sup>①</sup>主要民族和自治中的少数民族的差异性会越来越大，这会带来诸种危机。

2、在各民族和中央政权之间设计政治自治和行政自治会带来另外层面的不平等。政治自治的权力地位高于行政自治。布尔什维克一方面打碎所有旧的国家机器，但在建立新的行政组织却不可避免将大民族和小民族考虑在内，设定政治自治和行政自治加以区分。因此，自治本身的独立性和行政本身的相对性为苏联解体后日后南高加索各相邻自治区之间的权力自主性争夺埋下了伏笔。

3、山民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首次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将高加索分为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而且也将奥塞梯分为北奥塞梯和南奥塞梯。<sup>②</sup>这种区分虽然没有找到史料原因，但却成为南北分离的既定事实。<sup>③</sup>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布尔什维克已经有效地建立起以确定区域和文化统一的民族认同，并在苏联的发展中积累了下来。在苏联解体后，南奥塞梯要求合并的诉求得以释放，为格-南冲突埋下了伏笔。

自治的政治设计为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的日后政治发展并未提供更多的政治互动。早在 1801 年奥塞梯作为格鲁吉亚的附属品（annexation）进入沙皇俄国。1918 年格鲁吉亚独立出去，同时南奥塞梯也被分离出去与他们北方同胞隔离。格鲁吉亚于 1921 年加入跨高加索联邦共和国（Transcaucasian Federative Republic），1922 年 4 月南奥塞梯自治州（South Ossetian Autonomous oblast）建立起来，晚于其同胞建立的北奥塞梯自治州两年。<sup>④</sup>闻一先生认为南奥塞梯没有与北奥塞

① T. P. Khlynina, 'Gorskie narody Kubanskoi oblasti. "Bol'shevistskaia model"' resheniia national'nogovop-rosa', in: N. F. Bugai (ed.), Severnyi Kavkaz. Natsional'nyeotnosheniia (istoriografiia, problemy). Maikop: RAN, 1992, p. 57.

② 闻一：“奥塞梯：亲情与仇恨”，《世界知识》，2006 年第 23 期，第 59 页。

③ Alex Marshall, *The Caucasus under Soviet Union*, Routledge: New York, 2010, p.152.

④ Svante E. Cornell, *Small nations and great powers: A Study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caucasus*, Routledge: New York, 2001, p.138.

梯成为自治整体源于三个因素：1、南奥赛梯战略位置重要；2、高加索山的阻隔；3、在成立山地苏维埃共和国之时，格鲁吉亚还未被控制。<sup>①</sup>正是这一历史的错位使得南高加索地区独自被划出来，也促使南奥赛梯将自己思考成苏维埃“因为能力而非意愿才被独自放置一边”。

1922年的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条提到将南奥塞梯作为自治州成为格鲁吉亚的一部分，跨高加索联邦共和国也在同年采纳，却并没有谈及南奥塞梯的地位问题。但这种表示就是默认南奥塞梯作为格鲁吉亚的一部分进入跨高加索联邦共和国。1925年跨高加索联邦共和国采用苏联宪法，也并没有提及南奥塞梯的地位问题。1925年5月，南北奥赛梯在莫斯科讨论重新合并的可能性问题。结果是消极的，因为它不是影响了俄罗斯就是影响了格鲁吉亚的地区完整，即使它们合并之后还是苏联的一部分。<sup>②</sup>1936年苏联宪法正式将南奥塞梯作为格鲁吉亚的行政自治州确定下来，这种地位一直维持到苏联解体。

## 二、族群-区域联邦主义与苏联民族治理

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是一个现代概念。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围绕着民族起源及其认同的研究中，形成三种有力的说法。1、原生民族论。依托于血缘关系和语言、宗教、社会生产方式等所建立起来的民族意识；<sup>③</sup>2、想象共同体——建构民族论，强调民族是社会和政治建构的结果；<sup>④</sup>3、政治民族论——强调民族与政治互动作用。<sup>⑤</sup>作为欧

① 闻一：“奥赛梯：亲情与仇恨”，第59页。

② Charlotte Hille, *State Building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Caucasus*, p.113.

③ 关于原生民族主义代表人物较多，较为经典有 Johann Gottlieb Fichte, *Address to the German Nation*, edited by Gregory Moo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德]J.G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 J. Hobsbawm, *On Histo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④ 这种观点与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息息相关。典型著作：Anthony Smith,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2006.

⑤ 对此研究最力当属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econd Edi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 edition, 2009.当然革命导师列宁对民族的诸多论述中也体现了这一观念。列宁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有阶级性。参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3卷、24卷、25卷、第26卷、28卷、34

洲东方的俄国在革命之际就已经提出自己的民族概念。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民族（*нация*）的经典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sup>①</sup>

按照马戎先生的理解，斯大林的界定民族概念时，“多少带有与当时俄国形势有关的一些政治性考虑”。<sup>②</sup>而且，“民族”明显带有政治意味，与当时苏联对各民族在政治体制的安排（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相吻合，同时斯大林淡化了文化和心理因素在民族中的作用。<sup>③</sup>在斯大林的概念发展中，他认为列宁的“民族自决权”针对的是民族（*nation*）——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而不是族群（*ethnic groups*）——奥赛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和吉普赛人。为了将这二者区分开来，斯大林在创造性地使用政治自治和文化自治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观念也影响到了列宁和斯大林对解决民族问题的看法，直接地表现在他们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过于乐观。1924年斯大林主持苏联第一部宪法，确定联邦制作为苏维埃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联盟是各平权民族的自愿结合”，确保分离权，但却同时要建立起“统一战线”，各民族共和国难以独立行使权利。<sup>④</sup>列宁认为由于颁布法律和建立自治区，苏联的少数民族受压迫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斯大林则认为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已经消灭民族纠纷的社会基础”。<sup>⑤</sup>

因此，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s*）在苏联已经被统归于服从民主集中制问题，服从联盟中央和党中央的权力划分问题。苏联的民族地位问题由于“格鲁吉亚事件”<sup>⑥</sup>的发生而变得复杂化了，“压

---

卷和41卷中对民族的论述。《列宁全集》第二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 [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1页。

② 马戎：《民族社会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③ 同上，第20页。

④ 孙锡安：“苏联解体的民族原因透视”，《俄罗斯研究》，1992年第3期，第4-5页。

⑤ 同上，第8页。

⑥ 斯大林要将格鲁吉亚划入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化的方略，坚持格鲁吉亚等国先加入南高加索联邦，遭到格共穆迪瓦尼等人的反对，由此格共被撤职或者调离，奥尔忠尼启则甚至在格鲁吉亚因为被骂为“斯大林蠢猪”而动手扇了当地党政机关的

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作为概念被提了出来，要求反对这种习气，强力实现民族平等。<sup>①</sup>但是列宁将其延伸出来，在后期无疑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却也增长了族群（ethnic groups）的民族意象。这种意象造成苏联各个民族都应在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使得族群相对于苏联的民族来说获得更大的政治发展空间。

民族自治、民族自决和联邦主义是列宁民族理论的三个重要基石。而苏联民族治理的实践则更多需要联邦制的支持。1924年1月，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第一部宪法，它用宪法形式确定统一的联盟国家是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联邦结构的最高形式。<sup>②</sup>但事实上，在民族之下有更多的族群，而族群形成的自治单位却也多受益于列宁的民族理论和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实践。苏联通过不同政治单位的设计来区分民族和族群，但族群却在苏联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的动员的土壤中得以生出政治意识，产生民族观念。菲利普·罗德（Philip G. Roeder）在1991年发表的《苏维埃联邦主义与族群动员》中，提出著名的“族群联邦主义理论”，将民族治理与联邦制度结合在一起，并使用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比对，认为这种制度造成“区隔”，强化族群精英的民族意识，反而为苏联解体奠定了基础。<sup>③</sup>在多民族国家进行的少数民族群动员会导致对自治（self-rule）或者自治的需要，甚或会导致彻底的分离（secession），而那些族群紧密密集定居的地域则更为普遍。<sup>④</sup>事实上，斯大林区将民族定义与区域更为密切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联邦制政治设计，再加上对自治的说明对于苏联地区集聚性很高的族群来

---

耳光，捷尔仁斯基调查后为奥尔忠尼启则做无罪声明，令列宁相当生气，认为“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愤恨，在其中起到了极大作用”，并要求托洛茨基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参见（俄）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351页。

① [俄]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续），《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2-353页。

② 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③ Philip G. Roede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43, No. 2(Jan., 1991), pp.196-232.

④ 另一些情况，则是族群并不要求分离，但却要求更多地参与到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中。参见 Svante E. Cornell, “Autonomy and conflicts, Ethnoterritoriality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uth Caucasus – Cases in Georgia”, Dissertation for PhD in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Uppsala University in 2002, p.5.



说是一个“强而有吸引力的因素”……也更容易爆发大型族群冲突而不仅仅在城市或者广泛存在的零散对抗。<sup>①</sup>

如何理解这一复杂的族群、区域和联邦的关系，为了清晰的揭示三者的内涵，本文采用松里公孝（Kimitaka）使用的族群-区域联邦主义（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作为分析单位，用来与更高层面的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及至最高层面的苏联人加以区分。<sup>②</sup>松里公孝认为，族群-区域联邦主义（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有六项内容：1、民族识别工作的垄断，布尔什维克严厉对待那些抗拒官方分类和民族行政区的少数民族或者族群；2、民族领域主义。保证少数民族享有他们自己的行政区域和次国家政府；3、主体民族（titular nation）概念提出，根据当地原住民（autochthon-ness）规则进行确认，而非人口统计数字；4、联邦制，各共和国，自治区之间直接与中央联系；5、脱离权，各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邦的权利，苏联是“自由共和国的联盟”；6、传统创造，发展族群的文化和语言，服饰和舞蹈，极大地鼓励这种族群文化创造活动。<sup>③</sup>

在苏联，族群-区域联邦主义的崛起曾经是高加索共和国最为重要的内容。<sup>④</sup>两种类型的少数民族存在着：一种是苏联认同的“民族”，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民族，以及位于南高加索的散居地的少数派，他们居住的区域被称为纳希切万（Nakhchivan）、赞格祖尔

①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Weak States, Rough Terrain, and Large-Scale Ethnic Violence since 1945”,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9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September 2–5, 1999, p.16.

② 松里公孝使用族群区域联邦主义(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是 20 世纪的政治现象，特指族群仅承认他们当地的行政区域并且依靠他们自己的次国家政府而行事，被认为是管理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式，是革命政权转向集聚和保存其前革命时代国家领土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工具。但松里公孝将其用于分析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和中国也是适用于苏联的族群区域联邦主义，却有很多不妥。首先，几国之间的政治结构有本质上的区别，其次，各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路径不同，难以比照；最后，几国的政治发展历史与现实有诸多区别，难以用一个概念划一。参见 Kimitaka Matsuzato, “The rise and fall of 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 A comparison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China and India), lecture in ECNU, 2013.8.7, ppt 2-12.

③ Ibid, ppt, 2-33.另参见 Kimitaka Matsuzato, “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 and A. D. Sakharov’s Constitutional Draft”, *Ab Imperio*, 2004 October, Issue 4, p.387.

④ Philip G.Roede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p.197.

(Zangezur) 和多山的卡拉巴赫 (Mountainous Karabakh)。<sup>①</sup>同时, 大量的亚美尼亚人和阿泽尔人集聚在格鲁吉亚, 特别是格鲁吉亚与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漫长的边界线上。第二种类型则是没有获得政治自治的“民族”, 即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兹人、南奥塞梯人和阿扎尔人, 阿塞拜疆的塔里什人 (Talysh) 和列兹金人 (Lezgins)。阿布哈兹人和阿扎尔人能够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待遇, 而南奥塞梯人则作为格鲁吉亚的大的族群而存在, 获得自治州的地位, 但其地位远低于北边的同胞。塔里什人和列兹金人在阿塞拜疆却没有获得到自治权。

虽然如此, 但相比而言, 奥赛梯人最有理由不满。他们的同胞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员, 他们连自治共和国的地位都没有获得。但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在苏联历史上称为南奥塞梯分离的教条。1、格鲁吉亚对苏联的政治不服从引起了全苏联盟的极大震动。在格鲁吉亚事件爆发后 30 年后, 1956 年由于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强力批判引起格鲁吉亚民众极大不满。3 月 7 日, 格鲁吉亚大学生上街游行、集会、高呼“不准批评我们的领袖斯大林。……他们将因攻击斯大林而付出血的代价。”<sup>②</sup>同时, 3 月 5 日至 9 日, 在阿布哈兹, 格鲁吉亚人和缅格列人同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布哈兹人发生冲突, 秩序一批混乱, 9 日到 10 日第比利斯混乱达到极点。<sup>③</sup>但是这些冲突最终都被苏联强力镇压。赫鲁晓夫谈及冲突时说, “重要的原因在于俄罗斯人在格鲁吉亚没有真正掌握实权, ……在领导中没有一个是俄罗斯人。”赫鲁晓夫见解看到了族群-区域联邦制在格鲁吉亚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的难控性特点, 却没有深入思考并改变这种制度上的问题; 2、格鲁吉亚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不仅影响到苏联的政治稳定, 也给格鲁吉亚本身的稳定带来问题, 但却鼓励了南奥塞梯分离的意志和决心。至戈尔

---

① 这三个省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的根源。苏联布尔什维克进入高加索之后, 将原先属于亚美尼亚的卡拉巴赫划给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将纳希切万从阿塞拜疆分离划给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直遭到亚美尼亚的抗议, 位于亚美尼亚的赞格祖尔 (今日的亚美尼亚的休尼克省) 大部分是阿泽尔人 (Azeris) 和亚美尼亚人, 却没有获得自治。

② 闻一: 《俄罗斯通史 (1917-1991)》,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342 页。

③ [俄]鲁·格·皮霍亚: 《苏联政权史 (1945-1991)》, 徐锦栋等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158 页。

巴乔夫时代，由于民主化、公开化和新思维的盛行，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思潮泛起，民族狂热逐渐发展。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如果脱离政治改革，经济领域不可能会有进步的改革。<sup>①</sup>至 1989 年奥塞梯人在其自治区已经占到了 2/3 的人口，另外 100 万奥塞梯人分布在格鲁吉亚其他地区。<sup>②</sup>奥塞梯人对格鲁吉亚民族主义非常敏感，同时也产生极大的模仿效应。作为生存在主体民族为格鲁吉亚地区，南奥塞梯时刻感觉到格民族主义的力量。“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格鲁吉亚是格鲁吉亚人的格鲁吉亚！”“用扫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以及昌图里亚等在第比利斯操练反对苏联活动，同时各式各样的政治团体成立。格鲁吉亚的大民族主义和反抗苏联的行为鼓舞了南奥塞梯的“族群”情绪；3、阿布哈兹的示范作用。同时阿布哈兹问题再次宣起波澜。阿布哈兹人似乎表达了更多的怨愤：

“阿布哈兹民族问题被逼近了死胡同。自治共和国土生土长的居民正处在大灾难的边缘，他们正在被强迫迁出……一切都在遭到迫害。沙文主义者撤消了阿布哈兹的学校，用格鲁吉亚语授课……”<sup>③</sup>

第比利斯的反映确是异乎寻常的一致，强烈谴责阿布哈兹的分离主义，第比利斯的民族之火被煽动起来。而南奥塞梯却有不同的感受，1989 年 8 月，奥塞梯人埃德蒙·尼克哈斯（Ademon Nykhas）支持阿布哈兹独立。接着南奥塞梯就发生大量的暴力族群冲突。<sup>④</sup>1990 年，南奥塞梯地方党因为抗拒格鲁吉亚大选而被取缔，南奥塞梯自治州单独将南奥塞梯升级为“独立苏维埃民主共和国（Independent Soviet Democratic Republic），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取消其自治的权利作为报复。同时，格鲁吉亚成为茨欣瓦利的唯一语言进行教授。<sup>⑤</sup>但是，南奥塞梯仅有 14% 懂得格鲁吉亚语言，情急之下埃德蒙·尼克哈斯向苏联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0 页。

② Svante E.Cornell, “Autonomy and conflicts, Ethnoterritoriality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uth Caucasus – Cases in Georgia”, p.109.

③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 54-55 页。

④ [美]斯万·科内尔，“作为冲突来源的自治——关于南高加索冲突的理论探讨（下）”，胡敬萍译，《世界民族》，2007 年第 2 期，第 22 页。

⑤ 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事后公开说说，“没有应该害怕南奥塞梯这个术语”，Svante E.Cornell, “Autonomy and conflicts, Ethnoterritoriality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uth Caucasus – Cases in Georgia”, p.109.

请求帮助。但是事态恶化程度要快，11月份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带领1万多格鲁吉亚人向“茨欣瓦利”进军，这明显让南奥塞梯人感受到了压力。<sup>①</sup>苏联军队的介入才使得这场冲突并没有迅速上演。但是，南奥塞梯在随后的12月民众选举中有70%选民承认“南奥塞梯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这一政治身份。<sup>②</sup>

但冲突最终在苏联解体之后爆发。苏联时代的政治设计和族群-区域民族政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南奥塞梯对自身政治属性的理解，从被压迫的自治区到迅猛发展的思想文化，奥塞梯所珍视战斗的精神得到苏联人的赞赏和钦佩。而格鲁吉亚初期被斯大林等人列为“孟什维克和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大本营，后期又为了维护斯大林的声誉与苏共中央发生冲突，晚期为了实现政治民族自决又与苏联发生争斗，格鲁吉亚的民族意识在曲折斗争中得以发展，对“本我”的要求更为强烈，很难接受作为自身行政自治州的南奥塞梯脱离自身而寻求独立。许多格鲁吉亚人认为南奥塞梯人享受自治从来没有感激过格鲁吉亚。<sup>③</sup>这种对自我认同的诉求是不允许存在内部的“其他诉求”。格鲁吉亚的信仰和理念与行动要求高度一致，却要面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历史遗留问题。<sup>④</sup>

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苏联的族群-区域联邦主义为这种族群冲突提供了制度动力：1、族群“联邦制”——南奥塞梯自治州不受到格鲁吉亚反对的自主发展；2、地方干部的当地族群化——格鲁吉亚人难以控制南奥塞梯的政治局面。“控制局面总是奥塞梯人，茨欣瓦利所有可能的位置都是如此。”<sup>⑤</sup>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对族群冲突最高垄断裁判权

① (美)斯万·科内尔，“作为冲突来源的自治——关于南高加索冲突的理论探讨（下）”，第22页。

② 闻一：“奥塞梯：亲情与仇恨”，《世界知识》，2006年第23期，第60页。

③ “Georgia: Avoiding War in South Ossetia”, *ICG Europe Report N°159*, 26 November 2004, p.3.

④ 关于信仰与实践的关系可以参见：Mehmonsho Sharifov, “The Self between political chaos and the new political ‘order’ in Tajikistan”, *Transcultural Studies*, (2006-2007) Vol.2, No.3, pp.315-317; Hegel’s point of view was profoundly discussed in 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Allan Bloom, ed., James H. Nichols, Jr., tra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 Press, 1969), pp. 3-31; 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itu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6.

⑤ Crisis Group interview with Gori Region government official, September 2004.

使得格鲁吉亚难以表现出强力的政治威信；民族-区域的结合也造成地区主体民族做大，也容易成为民族压迫和歧视之源。最后，苏联对原著民族的支持和传统创造以及对宪法规定的“分离权”都从制度上给与分离一定的合法性支持，从而带来诸多的族群问题。南奥塞梯仅是其中一撇，阿布哈兹、纳卡冲突、德涅斯特左岸，北高加索<sup>①</sup>甚至在中亚<sup>②</sup>都可以轻而易举看到这种冲突的存在。

### 三、苏联解体、战争与族群民族主义

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却是苏联领袖们未曾想到的。在诸多文献中，阐述苏联解体是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结果的论述屡见不鲜。<sup>③</sup>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直接指出苏联的“民族问题”使其处境犹如 80 年前的沙皇俄国，并难以摆脱困境；而其解体是经济危机、政治合法性和民族问题三个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sup>④</sup>冯绍雷先生分析俄国的民族主义状况，阐述俄国顶层的政治设计不仅没有优化民族关系，在本质上激化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观念等因素，而最终的中央政权对民族分离“迟疑不决”使得苏联无法及时应对晚期的民族危机从而解体。<sup>⑤</sup>雷日科夫更是绘声绘色讲述了民族主义在各

① Ceslav Ciobanu edited, *Frozen and forgotten conflicts in the post-Soviet State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Moshe Gammmer, *Ethno-Nationalism, Islam and the State in the Caucasus*, post-soviet order, New York:Routledge,2008.

② John Heathershaw, “Conflict Management in Central Asia: Great Powers and State Formation”, lecture in ECNU, 2012.6.10, ppt 1-36.

③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欧美国家就开始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成立研究机构、出版一系列著述探讨苏联民族问题，1970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苏联东欧民族问题研究委员会标志西方对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进入新阶段；1983 年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苏联民族问题研讨会则将苏联民族问题研究推向高潮。欧美学者一般认为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产生分离主义，而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关于研究苏联解体的具体文献梳理参见潘广辉，《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欧美学界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冯绍雷教授，2004 年 5 月，上海。

④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版，第 492-293 页。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⑤ 冯绍雷：《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下）》，北京：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122-140 页。

加盟共和国的狂热活动如何使苏联陷入危机而无法自拔。<sup>①</sup>

苏联解体并不仅仅是一个帝国的终结，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开始。盖达尔将苏联比附为一个“联合很多民族的极权主义的强大国家”，却难以解决民族问题而消亡。<sup>②</sup>这个领土毗连的帝国——苏联在解体后给欧亚世界带来巨大的地缘动荡。尽管在松里公孝看来这种解体是和平的、内部的瓦解和崩溃，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却因为解体而饱受战乱之苦。<sup>③</sup>以苏联解体为背景的战乱和冲突，不仅基于历史因素、环境争斗与利益对抗，却或包含了“民族主义”、“分离”、“独立国家”以及“地区完整”和“主权”的新兴概念及其过度的政治动员。<sup>④</sup>南奥塞梯人作为格鲁吉亚内部的族群则提出自己的独立要求，并希冀从格鲁吉亚分离。

在1991年之后，莫斯科中心出现了以叶利钦为首从俄罗斯联邦政权，在建国之初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上，并没有创造出一种强有力的集体话语来整合与应付苏联留下了的民族问题。联邦中央的无作为引爆了高加索地区的民族炸弹。而新兴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则更是将重要精力投入到集权之中，以主体民族构建出来的单一政治民族也造成了民族问题丛生。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印古什-奥塞梯边界以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冷冲突”（frozen conflicts）以及常常发生的车臣“热战”（hot war）最终给高加索留下了集体的“记忆”，并将持续性地影响着高加索政治情势的变化。<sup>⑤</sup>

由于没有联盟中央的控制，新兴国家的存在促使高加索地区开始思考“国家间政治”。地缘政治范式、自由主义范式、民族主义范式成为高加索各地思考当前政治情势的重要依据。在苏联时代民族主义狂热的格鲁吉亚在苏联解体后转变为无数个不同范式诠释的重要场域。而格鲁吉亚内部的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和早期的阿扎尔问题则成为南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② [俄]叶·基·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③ Kimitaka Matsuzato, “The rise and fall of ethno-territorial federalism: A comparison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China and India), lecture in ECNU, 2013.8.7.

④ Vicken Cheterian, *War and peace in the Caucasus, Russia's Troubled Frontier*, p.7.

⑤ Alex Marshall, *The Caucasus under Soviet Union*, p.303.

高加索地区复杂认知斗争的核心焦点。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的分离在格鲁吉亚人看来更多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阴谋，是莫斯科通过族群战争分化瓦解格鲁吉亚国家的诡计。<sup>①</sup>而在莫斯科看来，格鲁吉亚这种想法无疑是受到美国的政治影响，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野心的直接投射。<sup>②</sup>但在南奥塞梯看来，南奥塞梯独立是一种“民族自决权”彰显，在格鲁吉亚治下南奥塞梯却要忍受不公正的待遇，族群的所有方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为了独立且“不惧一战”。<sup>③</sup>西方却将其视为俄罗斯的“新帝国论”的展现。<sup>④</sup>1990年6月，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通过法案互相否定对方。格鲁吉亚否定了奥塞梯的自治的地位，同时奥塞梯将自身的自治权提升到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双方都通过官方的文件将对方视为非法、不诚实和有罪的。<sup>⑤</sup>为了解决南奥塞梯的地位问题，1991年格鲁吉亚军队进入茨欣瓦利，导致了一年的混乱和城市巷战。<sup>⑥</sup>虽然俄国介入带来停火，但是战争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大约1000人死亡，100人失踪，大量的房屋和基础设施被毁，同时产生大量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up>⑦</sup>。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的战争加剧了奥塞梯人民族主义的高涨，1992年1月19日，98%的奥塞梯人投票支持南奥塞梯的独立。苏联时代留下来的格-南族群的冲突，与苏联解体后的争斗侵袭促使南奥塞梯加紧寻求独立的步伐。分离的发生获得了体面的合法性要素——寻求不被控制的独立，抵御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的“种族灭绝”（genocide）。<sup>⑧</sup>

① Roger Rosen, *Georgia, A Sovereign Country of the Caucasus*, p.25.

② Vicken Cheterian, *War and peace in the Caucasus, Russia's Troubled Frontier*, p.19.

③ Rebecca Ratliff, "South Ossetian Separatism in Georgia", ICE Case Studies, No.180, May 2006, cited from <http://www1.american.edu/ice/ossetia.htm#r1>

④ [英]罗伊·埃里森，“武力抑或外交政策工具——评俄罗斯对格鲁吉亚战争的官方话语”，《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第81-93页。

⑤ Dmitry Udalov, "The Georgia - South Ossetia Struggle - the Roots of Conflict", 21-Jul-04, cited from <http://www.worldsecuritynetwork.com/Other/dmitry-udalov/The-Georgia-%E2%80%93-South-Ossetia-Struggle-%E2%80%93-the-Roots-of-Conflict>

⑥ "Georgia: Avoiding War in South Ossetia", *ICG Europe Report N°159*, 26 November 2004, p.4.

⑦ Report on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Between Russia and Georgia on Economic Rehabilitation in the Georgian-Ossetian Zone of Conflict". 14 September 1993. 根据报告，战争带来342亿俄国卢布（根据1992年价格来算为260万美元）。停火最终在1992年6月28日实现。

⑧ Dmitry Udalov, "The Georgia-South Ossetia Struggle-the Roots of Conflict", 21-Jul-04.

与此同时，格鲁吉亚与奥塞梯的人口迁移变得频繁起来。虽然准确数据很难统计，但在格-南冲突中约有 4 万到 10 万奥塞梯人从南奥塞梯和格鲁吉亚逃离到北奥塞梯和俄罗斯联邦，而有 1 万人来到南奥塞梯。<sup>①</sup>另外还有 1 万格鲁吉亚人以及其他混合民族人逃离南奥塞梯，5000 人流离失所。<sup>②</sup>而 1992 年的停火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安居潮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官员看到“大量的无家可归者和返乡者还是流离失所……很多人如果没有必要……都不愿意回到他们的出生地。”<sup>③</sup>

族群民族主义伴随着 1992 年的停火开始愈演愈烈。多民族共存的生活条件被打破，民族-地域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族群相互分离的现象越演越烈。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到 2004 年为止只帮助 278 名格鲁吉亚家庭回到南奥塞梯以及 86 名奥塞梯家庭回到格鲁吉亚。<sup>④</sup>但是这些数据可能夸大因为很少有家庭回去的——大部分人都卖掉了他们的不动产，“我们没有获得预想的结果”。<sup>⑤</sup>南奥塞梯鼓励居民回来定居，但格鲁吉亚却很少帮助这些人实现这一点。在整个对峙期间，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停火而改善，反而停滞不前。

族群民族主义的发展逐渐倒向了分离主义。分离成为南奥塞梯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今天奥塞梯精英经常提及“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重新统一（re-unite）的民族？”<sup>⑥</sup>他们指出，自 1992 年停火开始，南北奥塞梯的联系就已经在各个领域得到加强。<sup>⑦</sup>为了增强南北奥塞梯之间的联系，2002 年南奥塞梯成立专门部门负责处理与北奥塞梯共和国的关系（Republic of South Ossetia Department for Rel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North Ossetia），旨在增强双方的农业、商业、教育和其他

---

① “Georgia in short”, UNHCR Country Operation Plan 2003,2009, July 1, p.190.<http://www.unhcr.org/cgi-bin/txis/vtx/home/opendocPDFViewer.html?docid=3d941f5a7&query=South%20Ossetia%20%201992>

② “Population Movement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Georgian-South Ossetian Conflict”, UNHCR Report, updated 1 September 2004.

③ “South Ossetia Briefing Note”, UN OCHA Georgia, January 2004.

④ “Population Movement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Georgian-South Ossetian Conflict”, UNHCR Report, updated 1 September 2004.

⑤ Crisis Group interview with Gori Region government official, September 2004, cited from “Georgia: Avoiding War in South Ossetia”, *ICG Europe Report* N°159, 26 November 2004, p.6.

⑥ Crisis Group interviews, Vladikavkaz, October 2004.

⑦ “Georgia: Avoiding War in South Ossetia”, p.8.



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交往增强两地联系。<sup>①</sup>

而这种内向成长的族群-民族主义带来的是与格鲁吉亚的对抗。尽管没有停火,但是对抗依然存在,军事冲突仍然成为双方的重要选择,这一“冷冲突”(frozen conflicts)存在将分离推向一个孕育期。在林奇(Dov Lynch)看来,冷冲突是俄国有意造成的结果,意在增加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力并维持现状,获得主动权。<sup>②</sup>但林奇却指出影响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无法克服冷冲突的另外三个层面原因:1、南奥塞梯对分离的坚持使得以联邦权力共享(federal power-sharing)的冲突解决方案难以达成,而南奥塞梯更为支持“邦联方案(confederation)”,这样就不会牵涉到内部主权的变化;2、作为未成形的国家,南奥塞梯的政治、经济相当脆弱。影子经济大量存在,大量资本和人员逃离。但是留下了的人没有选择,安全需要远远大于经济需要。为了获得资金,犯罪经济体形成并维系政府运作。而南奥塞梯作为连接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要道,在走私贸易获得更大的便利<sup>③</sup>,而这些便利又维系着政府财政收入以及冷冲突的继续保持;3、难民。大量逃亡的难民促使地域-民族开始迅速整合,形成有利于土地、民族和政府的三位一体的有利格局。<sup>④</sup>而这些恰恰是苏式“政治民族”形成的关键。

自1992年南奥塞梯击败格鲁吉亚军队并实现了对其地域的部分控制,南奥塞梯的政治地位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苏联时代格鲁吉亚行政自治州转变为南奥塞梯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outh Ossetia),成为能够与格鲁吉亚进行谈判的独立的政治单位。1992年的俄罗斯、南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签订索契协议(Sochi Agreement),成立格鲁吉亚-奥塞梯冲突解决联合控制委员会(Joint Control Commission)。但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格鲁吉亚由此退却:1、南奥塞梯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经济,之所以能够依然对抗。主要是来自俄罗斯和高加索人民的非官方军事援助;<sup>⑤</sup>2、政府只成功实现对南奥塞梯地区的部分控制,相

① “Georgia: Avoiding War in South Ossetia”, p.8.

② Dov Lynch, “Frozen Conflicts”, *The World Today*, August/September, 2001, p.36.

③ Ibid, p.38.

④ Ibid.

⑤ Nicolas Lemay-Hebert, “Zone of conflict: Clash of paradigms in South Ossetia”,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and Caucasus Studies*, vol. 3, no. 8, 2008, p.70.

当一部分的村庄还在第比利斯手中。而难民的大量逃亡也使得共和国政府“国家建设”非常困难；3、亲格鲁吉亚派别的存在。共和国前总统楚比科夫（Lyudvig Chibirov）倾向于与格鲁吉亚更为合作立场。格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与楚比科夫在1996、1997以及1998年见过三次面，双方都公然表达了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案，并在2000年楚比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最终达成重新合并（re-integration）的一致意见。<sup>①</sup>

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时代政治上维持现状的遗产并没有被格鲁吉亚的继任总统萨克什维利顺利继承。南奥塞梯分离倾向受到遏制的情势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之后急速转变。失败国家（failing nation）成为萨克什维利要应付的重要内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97%国民支持总统的势力在格鲁吉亚议会也占据多数。<sup>②</sup>就任初期，萨克什维利宣称他要继承大卫四世（即前文谈及的创建者大卫）的遗产，“我们都必须说：格鲁吉亚将会统一并且强大，格鲁吉亚将会恢复力量并成为统一的强大的国家。”<sup>③</sup>新政府上台第一步则是重新定义与南奥塞梯的冲突，将南奥塞梯视为一个“犯罪”问题，应该通过法律方法解决。<sup>④</sup>第比利斯在南奥塞梯制定反走私法案，并在格鲁吉亚离南奥塞梯村庄附近部署军队，并封锁当地道路。<sup>⑤</sup>这不啻对南奥塞梯的经济重大打击，“在格鲁吉亚加大惩处走私力度，南奥塞梯政府维持收入和政体都变得异常困难。”<sup>⑥</sup>

正是格鲁吉亚对主权的恢复和要求以及对走私的打击再次推动南奥塞梯族群-民族主义走向高潮。2001年选举出来的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族群-民族主义者爱德华·贾巴耶维奇·科科伊季在2004年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的军事冲突后获得广泛支持，并于2006年成功蝉联总统。他的同盟者也认为如果不是萨克什维利，科科伊季也不会成为“民族

---

① “Georgia: Avoiding War in South Ossetia”, p.8.

② “Georgia’s Strategic Vision and Urgent Financing Priorities”, 2004-2006, article presented to the Donor’s Conference, Brussels, 16-17 June 2004.

③ Giorgi Sepashvili, “Saakashvili vows improvements with Drastic Measures”, *Civil Georgian Report*, 25 January 2004, www.civil.ge

④ Dov Lynch, “Why Georgia matters”, *Chaillot Paper*, February 2006, p.42.

⑤ Ibid.

⑥ “Saakashvili: South Ossetia will be Reintegrated”, *Civil Georgia Report*, 11 July, 2004, www.civil.ge

英雄”，更不可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持。<sup>①</sup>

科科伊季在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对峙中获得了巨大的个人魅力。而得到俄国的支持更加增强了科科伊季维护南奥塞梯“安全”的决心。2003年的1月，格鲁吉亚报纸登载俄国帮助南奥塞梯建立起军队，并提供援助。<sup>②</sup>冲突逐步升级的格-南关系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战争。<sup>③</sup>

2008年8月7日午夜，萨克什维利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向南奥塞梯发动进攻，八月战争爆发。格军遭到南奥塞梯的强烈抵抗，同时俄军进驻南奥塞梯击退了格鲁吉亚的进攻，并迅速推进，一度接近第比利斯。8月12日格俄两国在欧盟的调停下实现停火。8月2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正式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国作为主权国家独立。八月战争震撼了欧亚大陆，美俄欧相继作出反应。南奥塞梯的族群-民族主义首次得到大国的承认。南奥塞梯的分离问题从高加索内部问题上升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在高加索的博弈的战略问题，并折射出宏观国际格局变化的重大端倪，预示着国际力量格局转换的肇始。<sup>④</sup>

八月战争给南奥塞梯的分离带来重大鼓舞，大国的介入使得萨卡什维利难以将南奥塞梯作为国内问题处理，南奥塞梯的国际性因素提升将大大打击格鲁吉亚统一的努力。而族群-民族主义在挣扎多年之后因为此次战争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因素，亲格派瞬时被亲俄派的科科伊季所打败，分离得到了俄国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则将促进南奥塞梯为获得国际承认而进一步努力。

## 四、结论

作为正在争取获得国际承认的南奥塞梯，战争给其带来的巨大的动力和信息，战争将南奥塞梯的分离问题国际化并得到广泛的国际社

<sup>①</sup> Oleg Teziev, "Kokoity's Opposition is Peering Out from Vladikavkaz", *Georgia Times*, May 14, 2009, <http://www.georgiatimes.info/en/articles/12531/html>

<sup>②</sup> Pavel Bave, "The South Caucasus: a challenge for the EU", *Chaillot Papers*, no.65, December 2003, p.79

<sup>③</sup> Svante E.Cornell, "Georgia after the rose revolution: Geopolitical predicam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February 2007, forward,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mi/>

<sup>④</sup> 冯绍雷：“从俄格冲突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危机政治经济学’——俄罗斯于大国关系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3期，第68-79页。

会关注。南奥塞梯的分离为“未被承认的政治实体”的分离带来巨大的动力和鼓舞。当今乌克兰危机也正在悄然酝酿分离之险，正在悄然预演南奥塞梯分离之情景。后苏联空间的政治发展如今已经面临巨大的分裂化趋势，欧亚后苏联空间的整合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如今得到俄罗斯承认的南奥塞梯基于历史与地缘因素等于获得了历史上的宗主国的认可，而正是这种认可使得南奥塞梯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而正是这种合法性使得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在对话和冲突时角色与地位发生悄然变化。分离从一种机制上的演变转变成一种政治上的身份认同，这种分离动力的转变让南奥塞梯向主权国家的方向迈出重要一步，并影响到格鲁吉亚的未来政治整合。

（责任编辑：赵舒婷）



## 论斯达尔夫人的政治思想

陈曦\*

**【摘要】** 斯达尔夫人对于文学和民族性格的著作广为人知。事实上，一系列政治主张才是她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生长于变革时代与世纪之交的她承袭了18世纪源自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潮，又掀起了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在宗教与自然力量之上她肯定人的价值和能力；亲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让她厌恶极端的政治狂热，推崇平衡的政治与温和的变革；拿破仑暴政迫使她踏上十年流亡之路，也更加激起她对于自由的渴望；她正视大众的力量，也仍然坚持精英引领和教化社会的责任。在女性缺乏正式影响和参与政治的年代，她的沙龙却成为了连接欧美政治家、思想家的精神圣地。

**【关键词】** 斯达尔夫人；政治思想

杰曼·德·斯达尔（Germaine de Staël, 1766年4月22日—1817年7月14日）是十八、十九世纪最传奇的女性之一，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她承袭了18世纪源自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又开启了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她的文学评论和绯闻轶事为人津津乐道，而她最看重的政治思想却在有关她的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本文将剥离纷繁的历史花边，试图呈现一个作为政治思想家的斯达尔夫人，描绘一个追求自由独立、以思考为最大乐趣的女性如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舞台上思考并影响政治。

斯达尔夫人充分吸收了启蒙时期关于政治、文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秩序的思潮。她从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那里学习到了有关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知识，前者对于塑造她的政治理念和社会观念起到了首要作用<sup>①</sup>，卢梭、孔多塞、马蒙泰尔、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派也是她的精神导师。斯达尔夫人又通过自己的作品将启蒙思想的精髓传承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生。

① Roberta J. Forsberg, H. C. Nixon, "Madame de Staël and Freedom Toda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12, No.1, Part1, 1959.3, pp.71-77

至 19 世纪，对欧美知识分子有着巨大影响。《论卢梭作品和性格的书信》（1788）、《论激情对于个人与国家福祉的影响》（1796）、《论文学及其与社会制度的关系》（1800）等早期作品奠定了她的文学地位。在流亡期间，她陆续出版了小说《戴尔芬》（1802）、《柯琳娜》（1807），并于 1813 年出版了最为人知的著作《论德国》，生前最后一部未完著作《论法国大革命的主要事件》也于 1818 年出版。

《论文学及其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以下简称为《论文学》）、《论德国》和《论法国大革命中的首要事件》是斯达尔夫人影响最为深远广泛的作品。《论文学》对于文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论德国》作为她最著名的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了德国的文学与哲学，推动整个欧洲进入浪漫主义时期，激发起知识界研究德国文化的热情。这本书在美国受到了空前的追捧，对于 19 世纪早期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产生尤为重要的影响。而《论法国大革命中的首要事件》则极大地影响了 19 世纪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展现了 1789 年法国革命后的荒淫无度、雅各宾派的恐怖专制和拿破仑的暴政，揭示了实现法国革命理想的敌人。<sup>①</sup>此书对于后世的历史编纂学也有很大影响。

这三部作品分别代表了她在研究中三个紧密联系的主题：文学、民族性格和政治。首先，文学受到民族特色的决定性影响，是同时观察精英思想和大众文化的途径。在宽泛的意义上，文学作为文化背景和社会土壤又塑造了一国的政府和政治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斯达尔夫人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文学家和小说家，但文学只是她通往政治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她从未单纯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片刻不离对于文学植根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分析。其次，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总体安排，决定性地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性情。最后，民族性格既决定了政治制度、社会思想和文学，又是它们的产物。她一方面通过文学与社会政治制度的关系来阐释所有文学，另一方面又在共和制的黎明来临之际试图引领欧洲延续其思想文化遗产和自由精神。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地贯穿于她的全部思想。

## 一、政治为什么重要

“比起其他所有学科来说，研究政府的运作规律是我的首要责任；立法的艺术、行政管理、谈判说服比其他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更为关键

<sup>①</sup> Tess Lewis, “Madame de Staël: The Inveterate Idealist”, *The Hudson Review*, Vol. 54, No. 3, The French Issue, 2001, pp. 416-426

和紧迫。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孩子们就有自由去研究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历史、军舰设计、航海、商业和农业，这样他们的孩子们就能够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毯和陶瓷”。这是斯达尔夫人的好友、美国政治家约翰·亚当斯 1780 年在巴黎写给妻子信中的文字。那个伟大时代的知识界与思想者普遍以政治为己任。同样的，斯达尔夫人的几乎所有作品也都是关于政治的，即便是对于文学和民族性格的思考也是在政治的维度展开。

政治是什么？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回答。生长于启蒙沃土、沐浴理性光辉而成长的斯达尔夫人认为，政治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而自我治理的全部努力，宪法意味着人类对于社会生活的总体安排。政治权力并非武力的强制和压迫，而是智慧、情感和学习所施加的影响，是思想的力量。<sup>①</sup>这本质上是一种源于 18 世纪的乐观精神，人们发现幸福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不取决于神力恩赐或受制于自然环境。政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彰显了人的能力和价值。无论是通过政府指导下的社会计划，还是通过个人偏好引导下的自由市场，政治都是一种人类自我管理的艺术。

斯达尔夫人赋予政治的重要性，其实是在高声颂扬人类摆脱神明恩赐或自然束缚等非人力因素，勇敢塑造自己命运的能力。曾有人认为斯达尔夫人是位“环境决定论者”。的确，受到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斯达尔夫人注意到了气候对人潜在的塑造作用。她在《论文学》与《论德国》等书中多次区别温暖灿烂的南方的人民与阴冷多雾的北方的人民在性格、观点和文化上的差异。她认为前者多理性主义者，诙谐幽默，想象力丰富，注重美感；而后者则深沉、内省、严肃、忧郁且较为情绪化。然而不能忘记的背景是，在斯达尔夫人的时代，气候对人的限制要远小于宗教对于精神和命运的束缚。与宗教宣扬的超自然力量相比，气候显然是人类更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求得适应或者改变的因素。因此，就自由而言，肯定气候的塑造力量不啻为一种人性从宗教桎梏下的解放。无论宗教和自然环境之前曾对世界施加过怎样的影响，她相信，18 世纪的人类已经认识到不必再为这些外界因素所奴役。正因为政治有这样的深义，斯达尔夫人相信，没有比政治研究更崇高的知识追求。

此外，政治不光能外向性地证明人的能力和价值，而且一旦确立又会被内化从而潜移默化地培育民族性格。这是斯达尔夫人赋予政治

<sup>①</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p.52-54

重要性的另一方面。人们常常将各国在实践中的差异归结到各自内生的民族特性上，斯达尔夫人则进一步认为所谓“内生的”民族性格也是由政治制度所塑造的。斯达尔夫人在《论德国》中指出：“只有政治制度能够塑造一个民族的品格”<sup>①</sup>，又说“政府是民族国家真正的指导者”。<sup>②</sup>一个民族的价值恰恰在于选择一个最适合本民族特性的政府形式。斯达尔夫人曾对英国倍加推崇——“不同于俄国人，他们在战争时对于损失和胜利都据实以告”——并认为其诚实品格来自一种源于自由宪法的道德完善。

政治是如此重要，斯达尔夫人又怎会满足于只置身于文学的狭窄天地呢？事实上，比起文学，她对政治的兴趣更为浓厚，文学只不过是她通往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她知道女性闯入政治领域可能的后果，但还是情不自禁地投身其中。<sup>③</sup>家庭传统、教育背景、人际资源和学术兴趣都让她醉心于研究和讨论那些政治领袖们关心的议题。她将所有的才华和研究精神都投入到广泛的比较政治研究领域中。<sup>④</sup>

## 二、自由的敌人

关于“进步”的理念是斯达尔夫人思想的核心之一，她认为这“进步”本质即是自由。自由主义者有两个永恒的噩梦，专制政府与无政府状态下的极端混乱。<sup>⑤</sup>斯达尔夫人在亲身经历中感受到这二者对于自由最真实的威胁，并将批评矛头对准了拿破仑的专制暴政与极端的政治狂热。

### （一）拿破仑的暴政

如前所述，斯达尔夫人强调政治制度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伟大角色。但这并非是鼓吹政府行动优先于个体行为。相反，在指出政治制度普遍影响的同时，斯达尔夫人也坚持在一定范围内保有个体处理私人事务的权利。然而，对于自由的强烈渴望恰恰让她成为专制统治的牺牲品，或者说施加于她的专制暴政更激发了她对于自由的渴望。

可以说，拿破仑是对斯达尔夫人影响最大的男性之一。1797年年

---

① Madame de Stael, *De l'Allemagne (On Germany)*, 1813, 转引自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283

②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52-53

③ Tess Lewis, “Madame de Staël: The Inveterate Idealist”, *The Hudson Review*, Vol. 54, No. 3, The French Issue, 2001, pp. 416-426

④ Roberta J. Forsberg, H. C. Nixon, “Madame de Stael and Freedom Toda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12, No.1, Part1, 1959.3, pp.71-77

⑤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



底，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后以征服者身份回到巴黎，成为斯达尔夫人沙龙的座上宾，这时拿破仑给斯达尔夫人留下特别好的印象，她还曾幻想拿破仑能够实践她理想的政治。<sup>①</sup>“她找一切机会接近他，感到既被他吸引又被他压倒，每每设法引他注意却总是瞬间无语凝噎。有一小段时间，她肯定想成为这位当代凯撒的朋友，当她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时，她感到极度失望。从这时起她就加入到他政敌的队伍中来。”<sup>②</sup>斯达尔夫人很早就敏锐地洞察到拿破仑的暴君性格、政治野心和对异见人士的狭隘不容，而拿破仑对于斯达尔夫人的政治抱负和影响力也格外敏感，还曾专门派兄弟约瑟夫·波拿巴劝说斯达尔夫人保持沉默和归顺。

雾月政变后，关于政治哲学的写作被禁止，而斯达尔夫人则遵从内心的意志继续出版作品，这些书在为她赢得巨大声誉的同时，也让她付出了十年流亡生涯的代价。拿破仑认定她是令人生畏的女阴谋家，下令将她驱逐出法国。虽然有着瑞士血统，但巴黎才是斯达尔夫人的精神祖国，“不得靠近巴黎 14 里”的命令给她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科佩特，这个流亡中的栖身之所对她而言只是策划重返巴黎的落脚之处而决然不是归宿。她曾深情地写到：“没有任何一座欧洲都城对于国家的意义像巴黎之于法国那样重要。不朽的艺术丰碑、天才们的永恒记忆、睿智而又伟大的社会，这一切都使得巴黎成为欧洲大陆文明的中心。”因此，“禁入巴黎、被迫流亡的恐惧使得所有人甘心成为拿破仑帝国里的奴隶。”<sup>③</sup>然而流亡的恐惧并没有让斯达尔夫人甘心变作沉默的奴隶。流亡之路上她从未停止思考和写作。《论法国大革命中的主要事件》和自传《流亡的十年》集中讨论了拿破仑和“暴政的艺术”。

《流亡的十年》正如书名所示，正是拿破仑掌权并下令驱逐斯达尔夫人之时，完成于流亡路上，是个体对于专制暴政的控诉。而《论法国大革命中的主要事件》则写于拿破仑倒台之后，关注拿破仑的政治角色，是政治学家对于拿破仑如何掌权、如何行使权力、又如何走向衰亡的理性分析。

按照斯达尔夫人的理解，拿破仑夺取政权的方式就是利用人们对雅各宾派暴政的恐怖记忆，不断提醒政敌和公众不与他为伍的恶果，塑造自己救万民于危难之中的救世主形象。他不惜以驱逐流放异见人

<sup>①</sup> Roberta J. Forsberg, H. C. Nixon, "Madame de Stael and Freedom Toda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12, No.1, Part1, 1959.3, pp.71-77

<sup>②</sup> 勃兰兑斯：“流亡文学”，《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9月，第94页。

<sup>③</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 13

士，窒息言论自由来树立绝对权威。他用特殊时期、国家和时代需要、稳定秩序等借口为自己逐步攫取的绝对权力进行辩护，为专制暴政披上了自由的外衣。斯达尔夫人总是期盼勇敢的人们能够大声驳斥拿破仑：“我们能够打败雅各宾派，也能够打败你。”

高压政治是不是通往自由的道路？无数的暴君以此为借口上台，无数生活在暴政下的百姓也以此为借口自我安慰。在《论文学》中，斯达尔夫人承认，一定程度的专制措施对于自由的建立是必要的。然而绝不能心存幻想：“专制政权下的制度会不遗余力地以一切面目冒充自由，但这绝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对自由的呼吁反而使得革命的反对者都去支持拿破仑。专制暴政下人们不再进行个体的思考，拿破仑采取暴君的惯用伎俩使其支持者成为可悲的依附者，反对者则沦为恐惧的大众。

法兰西皇帝与思想女王的斗争持续了 14 年。斯达尔夫人对于拿破仑来说是一个不大却很持久的困扰，而拿破仑却像磨石一般磨砺了斯达尔夫人的才华。<sup>①</sup>拿破仑的审查制度和出版禁令让她亲身感受专制暴政对于自由的窒息；拿破仑的驱逐令使她被迫走上流亡之路，却让她的思想远播欧洲各个角落；关于拿破仑崛起、执政、倒台全过程的分析更成就了她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和理论主张。斯达尔夫人的全部努力都旨在让她的同代人和后代明白，拿破仑绝非启蒙运动与大革命孕育的那些崇高思想的传播者，“我相信我已经表明，拿破仑是自由最致命的敌人，无出其右。”<sup>②</sup>

### （二）疯狂的政治

政治狂热与极端主义被斯达尔夫人看作是自由与理想政治的另一大敌人。在论述中，她区别了宗教的狂热主义与政治的狂热主义：宗教狂热通过描绘彼岸“遥远而美好的未来”来吸引信众，而政治狂热势力则试图让拥趸们相信此岸的享乐也可以毫无约束。二者都是社会生活中极端主义的典型代表，都是在错误的信念支撑下让一切事物都走向极端。

斯达尔夫人认为，“对于某些抽象思想的绝对忠诚滋生了政治狂热主义”。这种狂热在雅各宾派恐怖时期（1793-1794）尤为明显。“在两个对立党派焦灼冲突的领域几乎不会有什么共识。所有的意见都因为差异而剑拔弩张。一点点反对意见就足以激起狂热党派的深仇大恨，

---

① Tess Lewis, “Madame de Staël: The Inveterate Idealist”, *The Hudson Review*, Vol. 54, No. 3, The French Issue, 2001, pp. 416-426

②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ë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59

每个人都不得不聚集在一群观点相似的人中间，在强盗丛生之处人们不得不结伴而行。在一个仇恨横行的国度，人们不得不加入政党以求得庇护。”<sup>①</sup>

狂热势力和极端主义总是寻求无限扩张，无形中加大了社会各势力之间的张力，直到冲突各方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隐患是巨大的。斯达尔夫人将政治运转比喻成滚滚向前的车轮，权力顶端的人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统治，而社会底层的民众却热衷于翻身换天地。她并不支持权力的车轮在底层力量的推动下迅速转动，也反对权力的车轮在掌权者的抵制下牢牢锁住长久停滞。她期待着社会能够根据既定规则实现稳定的更替与温和有限的改良。

极端的狂热势力会撕裂整个国家，而国民议会则是全社会的黏合剂，以真理的名义团结起所有人。斯达尔夫人曾说：“赞成君主制的不一定是奴隶，赞成共和制的也不全是暴民”，“那些信仰联邦制是大国共和唯一可能的人，那些信仰君主制是领土统一唯一方式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在国民议会里大声说明自己的观点。”<sup>②</sup>国民议会将重新建立起公共讨论的平台。

为了实现温和改良而非极端的暴力革命，斯达尔夫人支持含有一定民主元素的制度安排。她特别推崇英国“代议制政府支持下的继承制”，继承制对于保障社会安定来说必不可少；而选举又为个人雄心开辟了渠道。继承制不符合理性的逻辑，因此由于出生的偶然性而登上权力顶峰的统治者必须被社会中最优秀者制订的宪法所约束。斯达尔夫人倾向于世袭的统治者，不一定很聪明，至少个性温和且没有太多权力欲望；由民选领袖也许更有能力，但也更有野心。在见证过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后，斯达尔夫人最倾心一个中等之才的统治者通过最完善的宪法实行统治。<sup>③</sup>需要注意的是，她强调含有一定民主元素的制度安排并不意味着她崇尚民主，事实上她更信赖由精英领导的政府。<sup>④</sup>

### 三、政治舞台上的精英与大众

作为世纪之交、变革时代的思想家，斯达尔夫人不像 18 世纪启蒙

<sup>①</sup> Madame de Stael, “Of Public Opinion”, 转引自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125

<sup>②</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 136

<sup>③</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 61

<sup>④</sup> Elisa A. Carrillo,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Views of Madame de Stael”,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26, No.4, 1964.10, pp.563-564

思想家们那样笃信精英的理性统治，也不像十九世纪浪漫派及后来者那样一味推崇大众的选择。她正视大众的存在，重视蕴含于民间的力量，但又强调精英对于全社会的教化与引领。对于精英与大众历史角色的认知也体现了从理性时代到浪漫时代的过渡特征。

## （一）精英的作用

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让她不可能仅仅作为法国公民（或瑞士公民），而是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她追求一种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和谐共生。<sup>①</sup>斯达尔夫人文选的翻译和编者摩罗·博格曾提出，欧洲精神是斯达尔夫人作品中隐含的一个重要思想。<sup>②</sup>在《论德国》中，斯达尔夫人曾特别提出“全欧洲思想家共同体”的设想，她描述到：“欧洲的精英们散落各地、素昧平生，一旦相遇则整个世界也无法阻挡他们相识相知。并非是宗教信仰、相似的观点或研究领域让他们彼此吸引，而是对真理的崇拜让他们惺惺相惜。”这是一种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边界的普世情怀，颇有全世界的精英（贵族）团结起来共同促进人类进步的意味。这不仅是她的思想与主张，更是她在现实中的生活方式。在她的时代，斯达尔夫人通过小说和理论著述将欧美各国的主流文化介绍给彼此，通过沙龙将全欧洲和北美的有识之士联系在一起，而她自己则是疏通、凝聚这张的精英之网的核心结点。科佩特，这个全世界的思想者心向往之的沙龙在 1807 年到 1810 年之间达到鼎盛。在这里，不仅有政治学家本雅明·贡斯当、文学家和经济理论家莱纳德·希思蒙蒂、翻译家和评论家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还有德国与波兰的亲王和公主们。<sup>③</sup>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个团结在斯达尔夫人周围的小群体甚至被后来者称为“科佩特派”。<sup>④</sup>

精英们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在思想文化艺术等精神领域开疆拓土，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然而更重要的是，精英们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主导和引领作用。斯达尔夫人最为理想的政治状态是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二者结盟合力推动国家的进步。前者即各国的掌权者，能够直接干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及其路径；而后者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群体，他们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能产生巨大影响。政治权

<sup>①</sup> Roberta J. Forsberg, H. C. Nixon, "Madame de Stael and Freedom Toda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12, No.1, Part1, 1959.3, pp.71-77

<sup>②</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51

<sup>③</sup> 勃兰兑斯：“流亡文学”，《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9月，第108页。

<sup>④</sup> Tess Lewis, "Madame de Staël: The Inveterate Idealist", *The Hudson Review*, Vol. 54, No. 3, The French Issue, 2001, pp. 416-426

力并非是强制的武力压迫，而是智慧、情感和学习所施加的影响，是思想的教化力量。正如她在《论文学》中常常论述的观点，精英们的思想与道德品质对民众会有极大的引领作用，因此决不能离开政治而孤立地看待文学。即便是那些鼓吹回避政治的作家们也是如此，“他们的不表态只是在纵容政治的邪恶势力，或者像科学家那样忽略它，或者像歌颂暴君的诗人那样欢迎它。”<sup>①</sup>由此可见，精英们肩负着引领和教化整个社会的重任，义不容辞。

## （二）民众的作用、变化及其根源

对于古代人和现代人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别及其根源是斯达尔分析政治舞台上民众角色及政府对策的重要基础。<sup>②</sup>

在古代，政府的一切行为都直接、紧密地影响到每个个体的生活。因此，古代人的自由是“政治的自由”，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每个人都与生活其中的政治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积极投身政治活动，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罗马的福祉包括了所有罗马人的福祉，所以极大地激发了个人利益的牺牲来促进公共的善。”<sup>③</sup>

然而在法国这样的大型现代国家中，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让人们独立于政治也能维持生计。很多阶级不参与政治、不关心政事，舒适并闭塞无知地生活着。“法国人一直相信政府的不作为会让一切变得更好。民众把政府视为障碍而非生活之必需。既然私人生活轻易地提供了如此多的乐趣，政府就不该再插手个人事务。”因此“公民的自由”或曰“个体的自由”才是现代人最需要的自由。现代人确信自己的利益在狭窄的政治领域之外，个体有权免于政事烦扰而只通过选举代表来影响政府决策。在大型现代共和政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实际上参与政治过程和政府决策，“在所有人不能充分享有和行使政治权力的国度，就必须充分尊重公民自由和个体自由。”<sup>④</sup>

“古代的自由意味着尽一切努力使得个人最大限度参与和行使国

①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53

② 关于古今自由之别的观点摘自斯达尔夫人《论法国大革命中的主要事件》中的“论公共舆论”一章。该书写于1799年，却迟至1906年才首次出版发行。从1794年开始就陪她一起流亡的爱人、政治与学术上的伙伴本雅明·贡斯当于1819年发表了为世人所熟知的演讲《论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摩罗·伯格认为这些思想是早年斯达尔夫人与贡斯当一起完成后由贡斯当加以延伸扩展的。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130

③ Madame de Stael, “Of Public Opinion”, 转引自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129

④ Madame de Stael, “Of Public Opinion”, 转引自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128

家权力，而当下的自由则意味着尽一切努力保持个体对于国家的独立。”现代的治国者们必须考虑到这种差异，不要再指望多数人能牺牲自己舒适的私生活来承担起公共责任。“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法国唯一能让民众支持共和制的方法就是尊重私生活和个人财产权。”“社会组织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体福利易于达到，也使得所有公民日益远离牺牲小我成全公共之善的原则。”<sup>①</sup>

正因为共同体规模的差异造成了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颠覆，所以掌权者统治和动员的方式也应随之改变。“为了赢得公共舆论支持，古人们常常要通过征战、胜利、纷争甚至是动荡来触及灵魂、激发起爱国热情，调动起公民的所有情感。”然而，现代的国家精神本质上需要安定。“在法国虽然有某种程度上的民族精神，但我们绝不能忽视的事实在于：公众舆论只会出于对安稳的热爱、对获得和保有财富的渴求”。“大众只图自己的幸福，全然不关心意识形态的争论。”<sup>②</sup>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民众只求安稳。但身处和平的人很难居安思危，老百姓也不会为了安定而战，为了将来的长治久安而放弃眼前的安稳生活。

斯达尔夫人认为公共舆论的这种被动性一方面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但也有其消极之处。在《流亡的十年》中她曾尖锐并悲哀地写道：“如果暴政完全依靠被充分说服者的支持，它将绝对难以为继。但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也最能揭示人类可怜又可鄙之处——大多数普通人只会为胜利的一方服务。”<sup>③</sup>但公共舆论对于任何有政治抱负的人都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公共舆论对于任何一点权力的宣称都很平静地顺从，但与此同时也恰恰是最无敌的力量。它从不应战，所以绝不会被征服。其影响不会被消除，因为它受到一切事物的影响。除了幸福安定它别无所求。战事一起它就会被忽略，但公共舆论作为真正的民族力量，只要我们想将政府立足于真实，我们就必须将公共舆论团结在共和制周围，否则政府将永无巩固之日。”<sup>④</sup>

### 三、理想的政治

<sup>①</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129

<sup>②</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126

<sup>③</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62

<sup>④</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129

在梳理政治的重要性、理想政治的两大敌人、精英与民众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之后，斯达尔夫人关于理想政治的轮廓逐渐清晰。总的来说，无论是立宪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只要是理性且温和的政治都是斯达尔夫人所向往的。思想上在 18 世纪理性主义的母体中孕育成熟，实践中又历经专制暴政下的痛苦体验，这都使得斯达尔夫人崇尚温和和法治。1795 年与贡斯当一起重返法国后，她的目的正式在于通过在法国建立起立宪君主制或德治共和国来重建秩序与良好政府，从而结束法国与反法同盟间的战争。<sup>①</sup>

历史大势，浩浩汤汤。虽然不甚情愿，但斯达尔夫人也尊重已经到来的“共和时代”，并进一步提出共和政治最重要的美德应是平衡。不仅仅是各阶级间的平衡或是政府各项权力间的平衡，更重要的是政治参与主体间的平衡。她并不像民主派那样主张大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一方面公民在政治过程之外不问政事只追求个体幸福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大众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参与政治过程也不利于自由和秩序的建立。因此，民主社会中的统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思想家）应该充分地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决策来确保启蒙的、自由的、温和的政治。此外，平衡对于斯达尔夫人还意味着要意识到各种价值和理想间内在的张力，诸如自由和秩序是不能兼顾的，必须以某些价值的牺牲为代价，但这种代价不能太高。斯达尔夫人曾将个体和民族国家的幸福定义为对立面的和解与协调：没有恐惧的希望，没有背叛的爱情，没有派系斗争的竞争等等。这就需要用平衡的方式在确保积极影响的同时尽量避免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

这种理性、温和的政治绝非易事，对于平衡的追求更是难上加难。斯达尔夫人从一开始就预见到曲折的道路：“可以想见，两端的极端势力都会攻击这一个共同的敌人（指政治中的温和派）。”<sup>②</sup>在写于 1791 年的论文“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国家中的主流意见？”中，她开始主张富有激情的温和立场。她并不认为中间的温和立场意味着软弱或无足轻重相反，革命期间的温和政党比起其他政党而言更需要“来自灵魂的勇气和思想的包容”。因为它必须同时针对两端的敌人展开两场战役从而避免两种危险。她坚信，一个更强大、更直接、更富有希望的超越两个对立极端的中间立场是绝对有可能实现的。斯达尔夫人所有的政治行动、思想和著作都致力于实现这一理想。

<sup>①</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12

<sup>②</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p.64-65

斯达尔夫人不仅在政治哲学层面指明了何为可欲的价值，更在政治科学层面试图探索出可行的路径。在这方面她深受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杰出的代表、数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奎斯·孔多塞的影响。

孔多塞将实证的数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中，其著作《多次投票达成正确决策的可能性》暗示着对于群体特性的计算将提高正确决策的可能性。早在 1785 年，这本书就征服了年仅 19 岁的斯达尔夫人。她曾在日记中写到，孔多塞和他的实证主义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科学里的开拓作用，正如牛顿和万有引力定律之于物理界。她相信这种新的方法论能够使哲学焕然一新成为精密的科学，能够用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

斯达尔夫人认为对于概率的计算使得评估特定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基于过去而预测未来成为可能。政府的决策应该充分建立在概率统计结果之上。斯达尔夫人曾大胆地想象这样一种情况：社会需要充满热情的人来推动国家进步，然而这样热情的人同样不会被动接受外界的安排从而给政府造成一定的麻烦。他们的能量为社会所需要，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因此随着政治科学和社会学计算方法的发展，政府应能够计算出个体热情被激发和安抚的程度，并在计算国民热情的可能分布的基础上制定政策，从而增加群体的福祉。<sup>①</sup>用数学来衡量和统计人的情感，这是多么大胆的设想！

与 18 世纪的很多启蒙思想家一样，她相信这样一门“人类科学”必须遵循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但她同时坚信道德——即人类的需要和判断——必须成为终极标准而高于概率计算。<sup>②</sup>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一定不能光基于概率计算更要立足于道德，“一旦计算的结果不符合道德，那一定是计算有误，无论第一眼看上去它显得多么正确无误。”她认为任何消弭个体情感或忽视个体苦难的计算都是错误和野蛮的，是没有说服力的。作为科学的政治将人类视为群体大众，而道德则重视个体。她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德一定要引领我们的计算，而计算一定要指引政治”。<sup>③</sup>

对于敌人与困难的清醒认识并未阻挡斯达尔夫人无可救药的乐观精神。关于“进步”的理念是斯达尔夫人思想的核心之一。她认为自

<sup>①</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55

<sup>②</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39

<sup>③</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43



然科技领域和哲学思想领域（即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自我认知）的进步是坚实和逐步推进的，但文化艺术领域的进步则与道德观念的命运相同，其发展历程时常受到政治状况的干扰而失去自由、迂回曲折。与早期进步主义的先知孔多塞一样，她不仅看到了个人生活和国家命运中的进步，更进一步观察到了人类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进步。她认识到她那个时代的首要问题之一在于抹平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只要国家间广泛的不平等存在一日，欧洲就永无宁日。“社会的进步应当是普世的，正如自然界的万物都趋于同等水平。”<sup>①</sup>因此她乐观地认为，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平等化有利于减少国家间的对抗。

斯达尔夫人对于近现代史三阶段的划分也有重大影响。她认为，起源于罗马文明衰落和北方各族入侵的现代历史，按照掌权者和享有自由的群体为标志可分为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和专制主义→代议制政府这三个阶段。这种阶段划分和描述方法一直影响到了今天<sup>②</sup>：

1、封建主义阶段。经济是地域化的，工商业还没有发展，土地只是财产的一种重要形式。地主行使权力且只有地主享有自由。之后有一个局部解放的阶段，亦即城镇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这个阶级通过自由市和小的共和政体达到了个体自由。但与此同时其他不自由的阶级没有任何进展。这种局部解放没有超出地域化的范围而扩展开来，因此不是一个独立阶段。

2、专制独裁阶段。国王不惜以牺牲荣誉来增加权力，积极与大众或第三等级结盟。全国性的政府开始出现并且日益集权和强大。在此阶段，商业有所发展。教会对于学习的垄断被终结。知识进步尤其是地理学发现和科学发明快速增长。

3、代议制政府阶段。皇族开始与民众分享权力。至今只有英国达到了这一阶段，但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朝着 17、18 世纪的英法革命所昭示的方向前进。

## 四、总结

一提到斯达尔夫人，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她一生中 with 贡斯当、塔列朗、拿尔伯等著名人士的情史逸事。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那个年代，女性缺乏影响和参与政治的正式途径，男人与社交便是女性通往政治的媒介。斯达尔夫人参与政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影响那些爱

<sup>①</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31

<sup>②</sup> Morroe Berger, *Germaine de Stael: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p.32-33

慕她并手握重权的男人们。正如摩罗·博格指出的，她高于一切的热情并不是爱情，而是对自由的渴望。她并不贪恋权力本身，而是旨在通过权力来延续启蒙、实现自由。更有人指出：“虽然她没有资格和途径参与到正式的政府事务中去，却能将18世纪的沙龙变成一个有关世界新秩序的非官方议会，来自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人都参与其中。”<sup>①</sup>

斯达尔夫人的政治思想千头万绪，不乏逻辑漏洞、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之处。她寻求稳定、秩序、等级制、群体联系和宗教信仰，也致力于进步、人与思想的自由往来、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与其说这些思想是她理性思考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敏感、热情的斯达尔夫人用炙热的文字对于亲身经历的历史变革最真实的感性记录。剥离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光环，这就是一个敏锐、智慧且多愁善感的个体对一切好的价值的热情赞颂。需要警惕的是，有些人习惯性地放大斯达尔夫人的女性标签并将上述特点都归因于性别因素。在那个政治论著也能写成诗歌的激情年代，她的思想、她的性情或是根植于变革时代的总体基调，或是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赋予的个体差异，决然不能荒谬地归结为性别导致的思考力差异。即便是拿破仑也无法轻蔑或嘲笑斯达尔夫人思想的力量。我们不必去苛责她有些地方不能自圆其说，也没必要纠结她高举理性的旗帜却无法摆脱浪漫多情的基因。恰恰是这种敏锐与真实让她凭直觉捕捉到了真理的影子，在政治思想的历史上留下一曲深情的咏叹。她炙热的文字、深沉的思考、对知识的执着、对真理的不懈追求都体现出女性作为政治思想家、作为人类严肃思想者一员的可能，体现出那个时代女性参与政治的努力和最高水准。

（责任编辑：朱文青）



<sup>①</sup> Roberta J. Forsberg, H. C. Nixon, “Madame de Staël and Freedom Toda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12, No.1, Part1, 1959.3, pp.71-77

# 如何以自愿原则为基础合理推导出私人所有权？

## ——以洛克和诺齐克相关理论的比较与评析为基础

杨一帆\*

**【摘要】**笔者认为洛克和诺齐克二人对于私人财产权如何合理产生的这一问题的论证都属于以自愿原则为基础推出私人所有权这一论证思路。通过比较和评析二种具体论证方案的优劣，笔者得出了“只有将自愿原则贯彻到私人所有权的产生原则中去，才能实现以自愿原则为基础合理地推出私人所有权这一理论目标”的结论。

**【关键词】**私人所有权；自愿原则；洛克；诺齐克

私人所有权是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1948年订立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一、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二、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sup>①</sup>

不管对于私人所有权的定义具体有哪些差异，但一般政治理论家和法学家都会承认私人所有权的核心“总是排他性的权利”，如莫里斯·科恩所说：“法律并不保证那些所谓是我的东西在物质上和社会能力上实际由我来使用，通过共同的规则可以间接帮助我消除行使财产权的一些障碍。但是财产权法直接帮助我消除其他人使用我的东西。”<sup>②</sup>

对于大部分西方政治哲学家来说，私人所有权是一个基础性概念，他们的很多论述都是以私人所有权是合法的作为默认的前提展开的。但是正如布莱克斯通所说：“几乎没有人愿意陷入考虑财产权利的渊源与基础的麻烦之中。由于乐于承认现有的财产状况，我们似乎害怕回溯财产是怎么被获得的，就如同害怕在我们的资格中具有某些缺陷一

\*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3 级硕士生。

① 联合国官网：<http://www.un.org/zh/documents/udhr/>

② Morris Cohen, Property and Sovereignty, Cornell Law Quarterly, December 1927, pp.11-13 转引自[英]彼得·斯特克、[英]大卫·韦戈尔著《政治思想导读》，舒小昀、李霞、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

样。”<sup>①</sup>

对于这样一个既重要又难以言说的政治哲学问题，思想史中的相关论述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而通过对于思想史的简单梳理，笔者发现洛克和诺齐克二人之间虽然有着思想上复杂的论辩和继承的关系，但是他们关于私人所有权的论证都可以被看作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从这二人关于私人所有权的论述当中，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以自愿原则作为基础论证私人所有权的合理性的思路的几种具体的方案，以及这些具体方案的合理之处与存在的问题。在经过了相关的分析和比较之后，笔者试图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给出一个理论上自洽的关于私人所有权合理性的论证。

所谓自愿原则又称个人自主性原则，它的核心含义是一个行为的合理性应该建立在个人之间的自愿行为之上。也就是说，个人意愿的真实性产生了某个行为甚至某种制度的合理性。笔者认为这个原则是建立在对于每个人个人价值和能力的充分肯定基础之上的。

笔者认为，启蒙运动之后，个人的自主性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们默认的前提——差不多每本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有意识的和理性的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和行使自己的政治偏好”的思想。因此，在以下行文中，自愿原则（个人自主性原则）将作为一个预设前提被使用。

### 洛克：在我的原则下，其他人都会同意

洛克认为，私人财产权是在人类已经形成了群体之后产生的。笔者同意洛克这种前提假设，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世界最初是人类共有的，那么将共有物划为私有物（也就是拥有了私人所有权）的那个人，就应该得到其他所有人的同意才行，但这显然是做不到的，那么私人所有权又怎样成为可能的呢？

洛克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见于他的名著《政府论（下篇）》的第五章——论财产权，下面笔者将首先简要复述一下洛克在这一章中的相

---

<sup>①</sup> [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208页。

关论证。

在这一章的开头，洛克便开宗明义地讲出了他的理论目标：“可是我将设法说明，在上帝给予人类为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之中，人们如何能使其中的某些部分成为他们的财产，并且这还不必经过全体世人的明确协议。”<sup>①</sup>

洛克依据的基本前提首先是最初世界归人类共有：“不论我们就自然理性来说，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因而可以享用肉食和饮料以及自然所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的其他物品；……正如大卫王所说（《旧约》诗篇第一百十五篇，第十六节），上帝‘把地给了世人’，给人类共有。”<sup>②</sup>

第二个前提是关于世界的利用应当最大程度地带给人类生活和便利的最大好处：“上帝既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亦给予他们以理性，让他们为了生活和便利的最大好处而加以利用。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的。”<sup>③</sup>

第三个前提是个人身体的自我所有权（衍生出对于自己劳动的正当占有）：“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sup>④</sup>

在这三个假设前提之上，洛克进行了关于私人所有权合理产生的论证，这个论证的核心部分由三个原则组成。首先是“劳动取得原则”，即某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才能将某物从共有的状态中剥离出来变为私用，成为他的私有财产（“根据这一点，任何人在那广阔的、仍为人类所共有的海洋中所捕获的鱼或在那里采集的龙涎香，由于劳动使它脱离了自然原来给它安置的共同状态，就成为对此肯费劳力的人的财产”<sup>⑤</sup>）。

①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18页。

⑤ 同上书，第19页。

“劳动取得原则”是财产权形成的基础性原则，后两条原则则是对于这条原则的补充和限制，它们分别是“他人充足原则”（在某人将一部分共有之物变为他的私有财产之后，剩下的共有之物可以保证其他人也可以取得和他一样多、一样好的共有之物作为私有财产）和“不腐烂原则”（某人转变为私有财产的共有之物的量要以他可以充分利用它们保证它们不至于最终腐烂为适当界限）。这两条原则共同划定了某人可以通过劳动取得私有权的共有之物的数量范围。由于这三条原则是严格符合三条基本假设的，所以推出这三条原则的过程就是论证三条原则下的私有财产权如何可以保证人类最大程度的维持他们生活和便利，并且与最初的世界共有状态和每个人的自我所有权不相冲突。洛克最后认为：只要符合以上三个原则产生的私人所有权就是合乎自然法的，也就是合理正当的。<sup>①</sup>

总结一下，洛克的思路大致是这样的：首先，他承认某人取得私人所有权的过程中，获得其他所有人的实际同意是不可能的。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洛克又认为所有人的实际同意是不必要的，因为在某些条件限制下的私人所有权可以使其他人达成一种“应然的同意”状态。换句话说，在这些条件下，如果其他所有人可以表态的话他们是会同意的。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是否有这样的限制条件，以及如果有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而洛克针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

对于洛克的这个思路可能存在的一种质疑是“应然的同意”是否能够代替“实然的同意”。假如我一个月前知道某只股票要涨价，我想去购买 1000 股，但是我当时忙于写论文而忘记了购买。那么，一个月后的今天我应该获得这 1000 股的利息吗？这种质疑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笔者认为这个质疑的思路和所有以“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社会契约”为理由来质疑社会契约论的效力的思路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应该更多在思想实验的层面上予以论证，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对于政治论辩的意义在于提供经验论据而不是直接成为政治原则，否则政治哲学就应该变成政治史了。

针对洛克的更有意义的一种质疑来自于他的一个重要的信徒和发

---

<sup>①</sup>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 18-32 页。

展者——诺齐克，他指出洛克的三条原则并不能保证其他所有人会达成“应然的同意”，而经过他的修正，这些原则才能达成这一目标。

## 诺齐克：重要的是不使他人的处境变坏

诺齐克对于私人所有权的论证主要是通过对于洛克的相关论述的评析和修正而完成的。

首先，诺齐克认为在私人所有权出现之前，世界处于一种“无主的状态”而非像洛克所说的“共有的状态”<sup>①</sup>。如果世界是无主的，那么某人取得世界上的某物就不需要征得其他人同意了。但是如果世界是无主的，那么最自然的分配方式就是先到先得了，而在后面的论述过程中，诺齐克的思路主要还是在寻找一条可以最大可能征得其他人同意的原则。

其次，诺齐克认为洛克的劳动获得原则是存在很多问题的。这条原则看似十分清楚，但是具体执行过程中会存在很多模糊和辨识不清的地方。比如围绕一块地修栅栏，那么我应该获得栅栏所围住的那块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呢（洛克是这样认为的）？还是应该获得栅栏下面紧连着的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呢（诺齐克是这样认为的）？更重要的是，仅仅以掺入自己的劳动就可以获得某物的私人所有权会产生很荒谬的结论，诺齐克在这里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如果我拥有一罐番茄汁并把它倒入大海，以致它的分子（使其带有放射性从而我可以进行检验）均匀地混合于整个大海之中，那么我是拥有了这片大海，还是愚蠢的浪费了我的番茄汁？”<sup>②</sup>笔者认为诺齐克的例子有力地否证了洛克劳动获得原则在初始时期的普遍适用性，或者这一原则被补充和限制，或者彻底放弃这一原则，诺齐克首先尝试了第一种思路。

诺齐克提出如果要想获得对某无主物的私人所有权，那对该无主物施加的劳动要使得该物的价值得到了提升而不是相反。这里，诺齐克为自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什么一个人的资格应该扩展到整

① [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② 同上书，第209页。

个物品上面，而不是仅限于他的劳动所创造的附加价值上面？”<sup>①</sup>这个质疑是有力的，其思路与之前关于用栅栏围起土地应该获得哪部分土地的争论是类似的。

笔者认为，诺齐克在这里提出的附加条件之所以不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何为使无主物的价值得到了提升？”实际上无法界定了，比如以诺齐克刚刚用过的将番茄汁倒入大海的事件为例。通过将番茄汁倒入大海，那么大海的价值是否提高了呢？那个番茄汁的所有者可能会认为价值提高了，毕竟现在这片大海的组成变为了“原有的物质+一罐番茄汁”了；而环保主义者可能会觉得这个想法很荒谬，因为这更像是一个污染环境的行为，它使得大海原有的价值受到了贬损而不是增加。

因此，这里的关键在于“价值的增加”是一个面临两难选择的概念。一方面，诺齐克必须对这个概念进一步进行界定，以使得它成为一个具有操作意义的概念。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赋予“价值”一个易于统一比较和判断的定义，比如“更多的价值”就意味着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或者更高的市场价值。但这样的结果一定会导致这个“价值”概念的实际效果变得偏狭可笑。比如按照上面的举出的标准之一——使得原物包含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标准来看，向大海倒入番茄汁的行为就增加了大海的价值。因为原本大海是不包含任何社会必要劳动的，而番茄汁毕竟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因此倒入番茄汁的行为使得那片大海的“价值”有了从无到有的变化，从而倒入番茄汁的人也就应该获得对于大海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如果只是停留在“价值”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上，所谓的“更高的价值”是一定会有不同的评价角度的，因此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对于同一个行为是否应获得某无主物私人所有权的不同判断。

笔者认为，诺齐克接下来做出了一个思路上的重大调整，之前他对于私人所有权的论证集中于对于无主物状态的改变之上（或者是将劳动与该物进行混合，或者是提高该物的价值），而之后他将判断标准转移到对于其他人处境的影响之上了。实际上诺齐克是在对洛克劳动

---

<sup>①</sup> [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取得原则进行了批判和改进的尝试之后，最终放弃了这条原则，而转向了洛克的他人充足原则，他试图通过对于该原则的重新阐释来为私人所有权的合理性找到一个根据。

诺齐克认为洛克的他人充足原则包含了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很多有价值的考虑。

“各种为人所熟知的赞成私人所有权的社会思考在这里出现了：通过使生产工具掌握在那些能够最有效率地（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的手里，它增加了社会产品；因为随着由不同的人控制资源，一个怀有新主意的人不必只有说服某一个人或一伙人才能进行试验，实验由此得到了鼓励；私人所有权能够使人们自己来决定他们希望承受什么样式和类型的风险，并产生出承受风险的专业类型；私人所有权通过使某些人拥有不是用于当前消费而是用于未来市场的后备资源，保护了未来的人们；它为那些不随和的人提供了就业的门路，让这些人不必去说服任何人或任何小团体来雇佣他们，等等。这些考虑出现在洛克式理论中以支持这样一种主张，即私人所有权的占有满足了存在于这种‘留有足够的和同样好的东西’的限制条款背后的意图，而不是作为一种对所有权的功利主义辩护。”<sup>①</sup>

进而，诺齐克指出某人占有某无主物对于他人处境的影响可能有三种情况：使他人处境变坏、不影响他人处境和使他人处境变好。诺齐克认为后两种情况都是一般人可以并且应该接受的，也可以达成洛克所期待的“应然的同意”，于是判断一个无主物是否被合理的私人占有的“关键的地方在于，无主物的占有是否是其他人的处境变坏了。”<sup>②</sup>

举例来说，小明和小亮同时生活在一片无主地之上，小明首先宣称对于该地具有所有权并且在该地块上建立了一个农场，小亮则变为了该农场的—个雇工。在这片地是无主地的状态下小明和小亮只能通过采集野果生活，平均每天只能获得 2000 大卡的能量，且要受到季节的限制。而在小明的农场建立之后，小明获得了农场的大部分收入，每天都可以有 5000 大卡的能量摄入，同时每年还可以有 100 个贝壳的

<sup>①</sup> [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11-21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12页。

财富积累；而小亮也通过工资收入可以保证自己每天 3500 大卡能量的摄入，并且每年也可以有 10 个贝壳的财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诺齐克的原则，我们应当认为小明取得了对于该地的合法私人所有权，因为他不但没有使得小亮的处境变坏，而且实际上他的占有行为大大地改善了小亮的处境，而小亮也因此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变化。<sup>①</sup>

笔者认为他也确实将洛克的原则修正得更为有力了，但是诺齐克在他的原则中违反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最不应该违反的原则中的一个：每个人应该有权自主评价和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在确立私人所有权的时候，获得其他人“应然的同意”的想法有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比如，小亮所关心的处境只是他每天能够获取多少能量和一年能攒下多少贝壳吗？笔者认为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评价他的处境是和个体自己对于生活价值的评价与设想紧密相关的，而诺齐克在给私人所有权的合理性制定原则的时候实际上预设了“物质条件的改善就是对于这个人生活处境的改善”这样一个前提，这无异于固定了一套理想生活的标准——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一个人和他合法取得某个无主物的过程实际上就成为了替别人对他们自己理想生活方式的做出评价和选择的过程：因为“我”的行为可以使得你们的物质条件得到改善，你们也就像理想生活迈进了一步，所以我的占有行为就是合情合理的。在上面的那个例子中，若按照诺齐克的原则，那么即使小亮喜欢的生活就是在半饥半饱中在自然的草地上玩耍和睡觉，那么这种对于理想生活的判断和选择也必须为小明的“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生活理想让步。笔者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重大侵犯，因为对于第欧根尼来说满是权力和财富的亚历山大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 结论：将自愿原则贯彻到底

综合洛克和诺齐克对于私人所有权产生的论证，笔者认为二者共同的思路大体是这样的：首先假定一个初始状态；其次，在之前设定

---

<sup>①</sup> [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213-214页。

的初始状态之下，私人所有权要通过自愿原则的检验才能合理产生，即经过私人所有权产生之时所有人的同意。

洛克和诺齐克的假定状态都是多人，不同之处是洛克认为此时的世界是为人类所共有，而诺齐克则认为世界是无主的。

洛克和诺齐克必须面对“某人占有某物的同时如何获得其他人同意”这个难度巨大的问题。洛克通过用“应然的同意”代替“实然的同意”转化了这个问题，之后问题的关键变成了：何种原则下，其他人能够达成“应然的同意”。洛克给出了三条原则，而诺齐克则将这些原则修正为一条。

但是正如笔者之前的论述，洛克和诺齐克的原则都没有达成他们的理论目标。那么，如何在“不只有一个人的初始状态”之下通过自愿原则推出合理的私人所有权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这条原则必须是自愿原则本身的一种体现，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客观标准。

笔者认为这条原则可以被描述成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在初始状态之下，世界由所有人共有；之后，通过分配每个人暂时平等占有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最后，人们通过自愿原则选择财产的所有制。笔者认为通过以上过程产生的私人所有权是能够达成“应然的同意”的，因此也就是合理的。

首先，关于世界的共有状态，笔者认为这个假设符合“个人应该在价值上平等”这个重要的价值判断，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这条价值本身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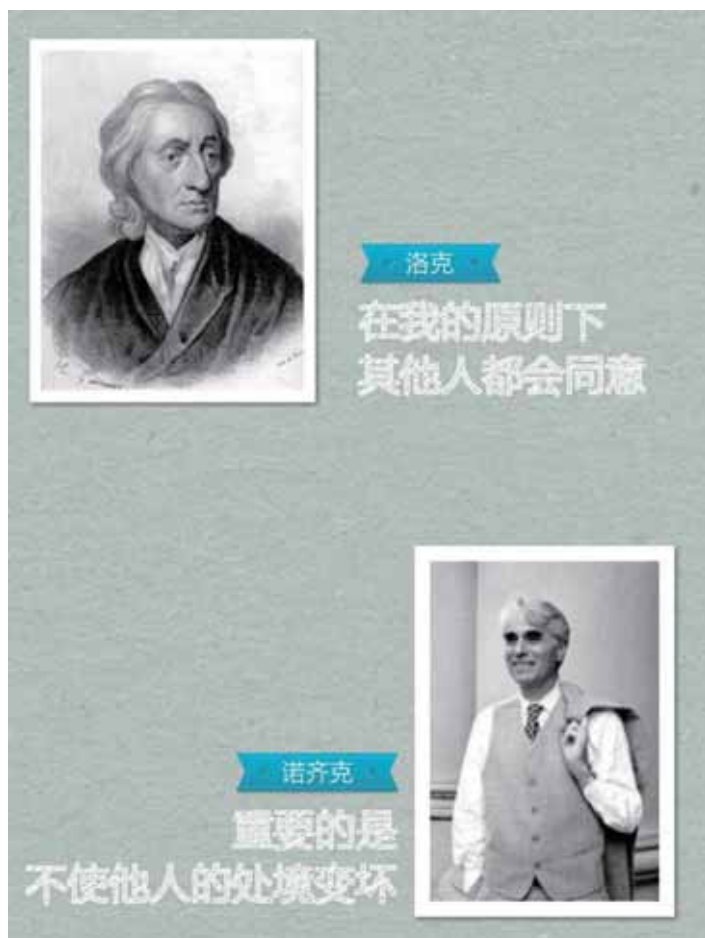
其次，在共有的初始状态之下，如何做到使得每个人平等地暂时占有整个世界的一部分？笔者认为最好的答案是借用“拍卖”程序。简述如下：设想整个世界的所有资源都被拍卖，每个人都参与这个拍卖会。每个人手中都有同样的购买力，比如 100 个贝壳，人们就用手中的贝壳通过喊价去竞买最适合自己生活计划的那些资源。如果拍卖会成功了（如果不成功可以重来），那么每个人都会通过“羡慕的检验标准”的检验，即每个人都愿意要自己拍得的那份而不是其他人拍得的那份。<sup>①</sup>笔者认为，通过了这一程序达成的暂时占有即可被称为平等

<sup>①</sup> [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43页。

的。

最后，在达成了对于世界的平等地暂时占有之后，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按照自愿原则选择自己认为更好的所有制，比如希望实行公有制的人们可以通过契约把他们暂时占有的那份资源合并起来在这些资源范围内实行公有制。而人们当然也可以选择将自己暂时占有的那部分资源在自愿的转让出去之前，永久的、排他的持有下去。在这个约定的时期过去之后，由于愿意单独持有自己那份资源的人的存在，私人所有权就形成了。当然，同时形成的还可能有集体所有权、国家所有权等等。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产生的私人所有权应当是合理的。

（责任编辑：李春燕）





## 乌克兰危机

自从去年 11 月乌克兰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后，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几乎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从最初的 Euromaidan 到亚努科维奇政权的倒台，从克里米亚入俄再到如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乌克兰危机不再仅仅是向东还是向西的外交摇摆，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乌克兰自身国家构建的失败。虽然距乌克兰独立也已过去 20 多年，但是其民众身份认同的分裂，尤其是东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无论在语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再加上各大寡头的操纵，乌克兰中央政府的虚弱在所难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相比名义上民主选举，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政府或许更为有效，而这方面普京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部分美国智囊相信美俄在亚太会有广阔的合作前景，但乌克兰事件却带来了另一番景象，不怪米尔斯海默指责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强硬。毕竟乌克兰涉及俄罗斯的切身利益，如果西方退后一步，对日后的美俄战略互信也是有所助益。眼下局势缓和，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仍是貌合神离，未来局势的走向仍不明朗。恐怕许多对美俄 G2 抱有乐观态度的名仕要黯然神伤了。

——王晓笛



乌克兰危机的演进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因为这场危机本可以不存在。但遗憾的是，我们几个月来共同见证了乌克兰局势如何从再正常不过的国内抗议演变成大国逐鹿的烽火前沿。

可以说，如果不是美俄两国长期缺乏战略互信，以及存在与此有深刻关联的战略误判，乌克兰局势难以恶化到今天的地步。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俄罗斯从出兵克里米亚到陈兵俄乌边境，尽管采取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势政策，但其战略实际上是防守的姿态。如果考虑到乌克兰语俄罗斯的历史文化渊源，俄罗斯的行为就更加容易理解。但是，美欧似乎并未对俄罗斯的心理有足够的认识。需知尽管俄罗斯帝国、苏联帝国作为政治实体烟消云散，但其遗留给俄乌两国的文化联系、民族认同和亲缘关系却不会随之改变。如果单纯把俄乌矛盾看作两个主权国家的争端，那么极易对俄罗斯的行为做出误判。目前看来，美欧似乎都陷入了这个陷阱。

乌克兰局势的变化无常，使得有效的预测殊为困难。尽管美国对

下周的乌克兰大选抱以期待，但若缺乏美俄基本的谅解与沟通，局势恐难以彻底平息。

——杨一帆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决定，暂停有关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准备工作，同时表示将加强与俄罗斯等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由此引发了乌克兰全面的社会和政治危机。透过现今的乌克兰局势及其所引发的各方反应，我们可以看到：

国际政治的现实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大国政治。乌克兰处于西方和俄罗斯两大力量之间，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大国政治中求得自主的生存空间，包围着乌克兰的这两大阵营，也从来没有真正考量过乌克兰的利益。相反，它们随时都可以为获取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而牺牲乌克兰。特别是西方，奉行双重标准，民主沦为大国博弈的工具。亚努科维奇本来是个民选总统，结果当他暂停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欧美主流媒体就把他描述成一个独裁者和十恶不赦的贪污犯，广场革命也立即爆发并且迅速被乌克兰极右组织暴力化。好端端一个民选政府就这样被推翻，而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则未经选举就被推上了舞台。

——王仙婷

关于乌克兰的问题，之前自己的看法一直都是跟着媒体舆论团团

转。媒体说这是俄罗斯的阴谋，是俄罗斯企图挑战国家主权不可侵犯问题的最大证据，是俄罗斯觊觎乌克兰的能源、黑海的便利条件，所以千方百计想找接口来发动这场“民族回归”，借此自己获利。但是有一天，一位老师在课堂上问我们，如果今天不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而是换成了中国和中国某个民族的问题，同样的情况，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会怎么想？当老师问完这个问题后，我陷入了沉思。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换作我是“局内人”，我可能也会支持我的国家保护我的同胞，我会义愤填膺的告诉每个阻止我的人：我们必须这么做，也一定要这么做，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但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我却对这种行为深深厌恶与反对。其实每个国际问题背后，都会有国家间的重重纠葛与纷争，但是我们不能只考虑大国之间博弈的输赢，而是应该更多的关注那些无辜受到伤害的人们。

——王璐

乌克兰十分不幸地处于东西欧文明的断裂地带，因此自独立以来便面临着内部分裂的威胁。但命运女神却未尝因此而忽视乌克兰，乌克兰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发达的工农业基础，自独立以来她还曾幸运地有过两次改变自身命运的机遇。独立之初，虽然乌克兰面对着社会转型和整合东部工矿业和西部商贸农业经济巨大差异的艰巨任务，但似乎这对于先天条件优越的乌克兰来说并不难完成；谁知各色官僚只知贪图中饱私囊，艰巨的转型任务无一完成，乌克兰就此失去了社会转型的最佳时机。橙色革命后，历史不幸地重演，政治精英的内斗瓦解了共同解决内部顽疾的决心。当下乌克兰陷入动荡与混乱的漩涡是否正是为本国精英不断错失历史机遇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对比独立时同样在东部拥有大量俄裔以及面对分裂威胁的波罗地海三国，乌克兰当下的命运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尤一唯

（责任编辑：席天士）





所有的战争都是内部的战争，  
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兄弟。

——弗朗哥·芬内隆

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武器  
和精神。在耐力赛中，武器总  
是被精神所打败。

——拿破仑·波拿巴

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不是  
一种对无神论不敬的态度，而是  
对散兵坑的不敬。

——詹姆斯·莫洛

总有一天科学的大脑会害怕  
其自身的潜力，它是如此地令人  
恐惧，即使是作为斗士的人类，

愿意为了带去痛苦和折磨而自己  
忍受痛苦和折磨的人类，也会对此  
感到恐惧，并永久地抛弃战争。

——托马斯·A·爱迪森

从来没有什么好的战争和坏  
的和平。

——本杰明·富兰克林

死去一个人让人悲伤，死去  
千百万人只是个统计。

——约瑟夫·斯大林

在和平年代中，儿子埋葬父  
亲。但是在战争中，父母埋葬儿  
子。

——克洛苏斯

1812年战争的唯一胜利者就  
是柴可夫斯基。

——所罗门·肖特

(责任编辑：席天士)





## 人性：在个人与体制 之间 ——关于《窃听风暴》 的浅思

李雪\*



“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

\* 李雪，南开大学文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在这样一个强大而威严的体制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渺小的，可以瞬间灰飞烟灭。

影片《窃听风暴》从 1984 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那是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统治的国度。和卫斯勒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一九八四》里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为“真理部”卖命。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处于没收的状态。

影片中，身为特工学校教授的主人公卫斯勒原是一名监听特工，是一个民主德国统治人民的国家机器，一个很合格的特工人员，他不苟言笑，业务熟练，虽然已经身为老师，在上课学生提出一个关于人权的异议的时候，他还会不自然的在学生的名字上打叉。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的表情，对时间敏感，生活有条不紊，他是那个时代很多德国秘密特工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合格的特工，他也是个木讷的人，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里想法，但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没有可能成为他的同学

那样的高官，永远只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在慢慢的工作着。他是体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

窃听任务初期，卫斯勒严谨认真记下勇者日常生活所有行动。而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例如雅思卡之死，豪瑟的反抗，德瑞曼抒发自己内心对艺术自由的渴求和呼唤，这些事都带给卫斯勒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触动。

思想的暴政带来的恐惧远比身体的奴役更为可怕。意识形态在那个时代取代了个人的思想，导致了体制内的群体无意识。每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牢笼，大部分人失去了对所处环境的反思能力。或许人们只想要一种很简单的生活。但这种愿望无从实现时，人们期待着通过出让自己的权利，甚至出卖肉体来换取暂时的安宁。但出让的结果却是让操纵国家机器的更加为所欲为。

“等一下，还有一个建议，我们不是学校，所有的工作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人民。”卫斯勒的老同学老上司最初这样对他这样说。极权主义制度的捍卫者，当他们喊着国家主义的宏伟口号，用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冠冕堂皇的名义来包装野蛮的行径的时候，却又在不断计算着个人的利益得失，不断做着由于自我的人性扭曲而显得极端无耻的勾当。当文化部长扯开自己的内裤，露出雪白而肥硕的臀部，强迫德雷曼的妻子和他做爱时，他丑陋

的嘴脸就像他的屁股一样苍白。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对于卫斯勒来说，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雷曼夫妇身上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性爱生活时，卫斯勒身上人性的一面才渐渐开始复苏。卫斯勒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不是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卫斯乐有了自己的私生活，他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由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他发现自己无法彻底变成一个无情的机器，无论是在和妓女做爱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真实欲望。

极权让人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公民肉体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与高潮的体验同样并非其他的人与物所能替代。《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日渐磨灭的人性。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正因为此，一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总是伴随着被压抑的性欲的破土而出，性欲觉醒成了良心觉醒的报春鸟。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电影《辛德勒名单》让这句铭文广为人知。人们赞美忠诚，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自救却不得不伴随着对旧体制的背叛与出走。为了保护德雷曼，卫斯勒开始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雷曼的相

关记录，并想方设法支走了他的监控搭档。窃听者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与信仰，不过，生活并非别无选择——卫斯勒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政治入侵私人生活，生活变得逼仄、窒息；个人面对体制，压迫无处不在，但人性是强大的。当特工卫斯勒选择背叛这个强大的体制，是个体的自我救赎、人性的回归。在个人与体制之间，人性闪耀着光芒。

卫斯勒在选择之时，他应该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如何，他也不可能期望作家有一天会写一本题献给他的书。显然，他之所以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样做，不是为了功利的得失计算，而是基于人性的良知。这也可以理解，在两德统一后，仍依然选择隐藏秘密，默默过完此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他不再是绝对必然性的奴隶，而是一个高贵而自由的人。他实现了自我救赎，获得了内心的安宁。

影片以主体阴冷而萧杀的基调反映了白色恐怖时代的特质，却在各处细腻体现了人性温暖和真实的光辉。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人性的善恶都体现的淋漓尽致。有人出卖了自己亲友，有人居位谋私，有人不能妥协与时局而以自杀抗争。但其间人性的美善被表达得分外深刻而细致：作家为救助自己朋友所冒的风险、相互间的资助；以及魏斯曼在监

听过程中的丝丝入扣的细微改变：他不动声色地支走可能会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窃听报告的细节，隐瞒了实情，以及最后紧要关头所做出的巨大牺牲。片中许多细节展示了这位史塔西细腻而深沉的内心境界，他在监听过程中体现出的孤独感和默默无言的隐忍；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他的上司询问他“你还站在对的一方吗”也做出了意味深长的回复——这些细节都完美地表达了角色中人性的那些微弱的闪光处。

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而用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曾经的岁月，不是为了憎恨，而是反思。虽然在特定的时期，暗魔蒙蔽了人性的光辉，但历史的进程永远不会因为某种力量而停滞不前。这部电影虽然借用了政治题材，但绝非仅仅以此为卖点，它表达的仍是最本真的人性。

（责任编辑：王晓笛）



## 谎言、诱惑和陷阱

### ——读《激进民主》<sup>①</sup>

#### 有感

田田\*



在我们的时代，民主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目标，或者诱惑。民主不仅许诺了平等、自由、公民权利，甚至连带地许诺了市场秩序、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对民主的信仰和追逐掩盖了对民主本身的理解。在道格拉斯·拉米斯看来，“大多数美国人，不仅一般的民众而且社会科学家对于民主真实意义的理解很混

乱。”他将这种混乱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虽然民主的本意是指人民拥有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力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它却逐渐被重新定义为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发展出来帮助人民赢得和拥有这种权力；二是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平等的民主理念只能适用于政治领域，不适用于经济领域。”因此，拉米斯致力为民主正名，引用汤姆·潘恩的定义：“民主是常识”。

“民主要求共识，这个词非常接近常识的意思”。对于民主制度，拉米斯坚持：“民主制度是手段，而激进民主本身——使人民有权力却不是手段。”“有些制度无论如何成功地接近现实民主，民主本身——像正义、平等和自由一样，仍然是一个批判性的标准，所有的制度都要经过它的检验。”作为目的，民主意味着将“效率”“实用”和“进步”等词的真正含义从经济学和技术中夺回——“如果使人民有权力被大家同意作为要达到的效果，那么任何削弱人民的经济或技术安排按界定来说是无效率的。”

拉米斯深入地分析了作为民主大敌的“发展”和“机器”。拉米斯决然否定经济发展与民主自由之间的共生关系。“经济的一词

① [美]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刘元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所有引用均出自此书。

\* 田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本身意味着一个历史学的特定现象，它意味着一个社会中组织权力的一种特殊办法，同时也是掩盖这种权力安排的一种特殊方法。”拉米斯认为经济发展是反民主的，因为“经济发展是建立和加强支配人民生活的主要方面——他们的工作——的不民主的统治形式；经济发展产生了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他将发展视为实现民主的失败策略，因为那些“抱着善良愿望的民主的发展主义者所梦想的‘真实的发展’将决不会发生”。亦即，发展主义者所期待的所有的人实现共同的富裕是不可能的。他引用约翰·拉斯金的论述：“‘富’是一个比较词，暗示了其相对的词‘穷’，正如‘北’毫无疑问地暗示了‘南’这个词。……财富之所以是一种力量就如同电之所以是一种力量：只是通过其自身的不平等或负极才能起作用。”拉米斯指出：“发展的意识形态把整个世界置于单一的尺度之下，因而把除了一种以外的社群生活的所有形式都贬为不发达的、不平等的和悲惨的。”而事实上，“如果财富是经济剩余，对于那种剩余要采取什么形式的分配，不同的社群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

与经济发展受到同样指责的是机器。“机器似乎是一种必然。”但是，“如果某种事物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集体生活的秩序，并且我们被告知我们除了接受它别无选择，而实际上我们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一个关于民主的问题。”拉米斯将机器看作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工业革命不只是产品硬件的革命，也是工作组织的革命。……设计新机器的意图是：重新组织工作和减低工人抵抗的力量。”技术决定工作秩序，而秩序是所有政治问题的开端。“选择一种技术你就选择了一种政治，工作秩序伴随而来。选择大量的消费你就选择了大量的产品和工作的管理秩序。选择大工厂你就选择了管理的寡头政治和社会不平等。”

民主的力量“在类别上是独特的，并且能够做其他种类的力量所不能做的事”，但民主的状态是“脆弱的”，“民主的状态提出了一个与古代的炼金术士的困惑相类似的问题：一个人如何能够既制造出一种万能熔剂又制造出容纳这种万能熔剂的容器？”拉米斯试图从雅典和罗马的经典民主模式中发现民主传统的缺陷。拉米斯尖锐地指出：“在政管世界之中普遍地建立起民主是超出我

们的权能范围之外的，一个可能的策略是寻求在一个或若干个国家建立民主：用一堵军事力量和社会歧视的围墙在这些国家周围，尤其用来对付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被剥削以给民主政体的公民提供闲暇和自由。”这样的策略继续维持的可能性正随着第三世界人民增长的自我意识而消减。“就激进民主而论”，“为了提防它败坏自己的精神，为民主而斗争必须不仅仅是为一个民主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一个民主的世界而斗争。”

拉米斯睿智的洞见和流畅的文笔相映成趣。他从容地批判人所共知的观点，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民主的追求剥离开来。在拉米斯的笔下，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犹如美丽的谎言和精心修饰的陷阱，以民主为诱惑，最终却深刻地剥夺了民主。这种回到民主本身的问题意识值得赞赏。但正如本书立意所指，“激进”是其弱点所在。民主或许是一种独立的追求，和经济发展无关，与技术进步无碍。对于无论是单个的人还是集合的人民而言，即使民主追求和物质追求之间并无先后高下之别，甚至没有必然关联，但二者是共生的，或者说，缺一

不可。丰衣足食但没有民主的生活或许是难耐的，那么，有充分民主而忍饥挨饿的生活难道是令人神往的吗？拉米斯提出他在菲律宾内革罗一家为台湾代工生产玩具娃娃的小型合作工厂为例证。参与工作的女工自行安排工作秩序，她们选择轮岗制，同时将缝纫机安置成圆圈，以便“在工作的时候互相交谈”。这样的安排无疑是降低效率的，但“这些工人把她们的的工作从凄惨的苦役转变为一种愉快的社会活动”。这个例子诚然足以说明工人对工作满足感的关心超过理论家们的想象。但从另一面来看，“在两年半的时间中这是她们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她们和她们的家庭靠这个补助计划来存活”。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心怀悲悯的理论家看到了工人在经济体系内被压榨的惨况，却没有看到，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体系，这些能够通过被压榨而存活的人可能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毋庸置疑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成长为更多的人提供生存的机会。如果说未成年的孩子在工厂中从事高强度的劳作而不幸早夭是非人道的一——当然也是不民主的。那么，如果在他尚是一个婴孩的时候就

因为食物短缺前途渺茫而被抛弃，甚至溺死，是否人道，或者民主呢？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来，拓展之势可谓无往而不利。甚至连有一整套坚固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生产组织方式的中国亦不能免。这个体系的强大可能并不承诺民主的必然实现，但至少，它为民主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无论如何，民主都是人类无可辩驳的理想。为民主设置经济和技术条件可以轻而易举地异化民主本身。最终，因为走出太远，忘记了因何出发。在经济迅速膨胀，技术高度发展的今日，尤当警惕。正如拉米斯最后的比喻：“明智的人将为冬天做准备：建造并充实储藏室，收集柴火，修理有漏的屋顶，加隔离层，这样安排是为了使夏天的热量能一定程度上带他们度过将来临的冬天。……但是这里也有一种危险。如果我们为冬天的准备做得太完全了，我们可能忘掉它是冬天。吃保存的食品，我们可能忘记新鲜食物的味道；站在火炉边，我们可能忘记夏天太阳的温暖。”

（责任编辑：李沁笛）



## 畸形的反抗——读 《自杀与美好生活》

### 有感

李沁笛\*

《孟子·告子上》中有一名篇叫《鱼我所欲也》，里面用鱼和熊掌的选择来阐述了一个道理，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个道理发人深省，但是从古至今，能真正辨明生死的人也算恒河沙数了。无独有偶，北京大学吴飞教授在其《自杀与美好

\* 李沁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生活》一书中也说“吾人重生，但有重胜于生者；吾人恶死，但有恶甚于死者”，前不久出了一桩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自杀的消息，让我不由又想起了吴飞教授这本书。

吴飞教授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性研究，论及关于自杀的理论，应该没有人比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探讨地更加细致，《自杀与美好生活》这本书更像一本政治哲学著作，一部以自杀这个视角来观察西方思想演变的著作，全书的主线是通过对自杀观念的演变的思考，透视西方人性观及相应的政治建构的演变。

该书的引言中就说自杀是“现代文明的一道伤口”，吴飞教授提到“虽然自杀问题被加缪说成‘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但这个说法很难在主要哲学家那里得到验证。诚然，在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当中，我们找不到几个完全没有谈过自杀问题的；但是，像加缪这样专门著书，或是像休谟那样专门写文章讨论的，却也少之又少；大多数哲学家是在讨论别的更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把自杀作为一个不得不说的附带问题附带谈一下。如果是这样，凭什么认为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

题呢？”（参见《自杀与美好生活》一书导言）

但是从书中可以看出，吴飞教授是相当赞同加缪的说法，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自杀关乎生死，有什么哲学问题比生死更重要呢？作者在书中说本书的目的是选取古典、中世纪、英国现代早期这三个时段，看其中的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和处理方式，由此勾勒出他们对待美好生活、人性善恶，以及政治建构的相互勾连、但又非常不同的思想脉络。

本书从加缪“唯一的哲学问题”开始，回溯到早期西方思想对自杀观念的不同理解，从而对现代社会是如何跌入“虚无主义”这一境地及如何克服“虚无主义”作出自己的回答。之所以要如此理解自杀问题，不是出于要对西方开出自己的药方，而是为了解中国的问题，自杀不过是其中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问题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切的，但“要回到最纯粹的中国式生活，恰恰需要对西方文明更地道的了解。”

吴飞教授在写此书前曾经做过关于中国农村人口自杀现象的田野调查，因此才有这本书的问世，他研究自杀问题，不仅仅是

为了找出中国人自杀的特殊模式和文化解释，也是以自杀问题作为切入点，从中国人切实的生活体验中，理解他们的苦与乐，寻找一种中国式的美好生活。

《自杀与美好生活》一书由不同篇目组成，书的开篇是对柏拉图经典名篇《斐多篇》的分析。《斐多篇》中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从生到死的过程展现，苏格拉底之死可以算是西方自杀现象的一个经典案例了。通过对苏格拉底的两难，既一边谴责自杀，一边又主动赴死的分析，作者得出古希腊哲人对自杀问题的思考是从属于德性问题，并非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古希腊的宇宙观和人性观，灵魂与身体的对立，而这种二元对立恰恰是柏拉图自杀辩证法中以追求德性为目的。人之生活，物质（肉身）的存在比较确定，精神的存在比较麻烦：哲学、城邦还是神？这三者不仅都会与肉身存在起冲突，而且彼此之间还可能起冲突。苏格拉底追求德性的哲学思考与城邦政治发生冲突，而柏拉图从城邦立法者的角度出发的，又在《法律篇》中谴责自杀，这两种对自杀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后世西方思想对自杀的不同理解。到了

奥古斯丁时期，基督教文化把三种最重要的德性定义为“信”、“望”、“爱”，“望”就是对上帝的拯救抱有希望，是建立在对尘世放弃幻想的基础之上再抱有希望，凡自杀者，即放弃上帝的拯救，放弃对上帝的希望，这显然不符合基督教义，因此奥古斯丁把自杀定义为“最大的罪”。

由此而来，《自杀与美好生活》一书提出，在西方自杀的主因是绝望。但是折射到中国，作者认为中国式自杀与西方式自杀明显不同。因为中国并非典型的宗教国家，所以很少出现强烈的道德绝望情绪，中国式绝望与其说是对道德没信心，不如说是对逆境、具体事实无法改变的绝望。从这一点来看，我倾向于认为中国式自杀，更深层次表现出的是一种反抗，是一种自杀者对于他所认为的不正义现象的反抗。

吴飞教授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提到中国农村许多人自杀，其实只是因为气性太大，譬如夫妻吵架，妻子一怒之下喝农药自杀，这种自杀现象具有相当大的随机性。中山大学研究生自杀的原因随着逝者离去已经很难查证了，但是无论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还是受过高等教

育的历史学硕士，他们的自杀不能说没有相似性，都是出于对当时当地所处环境所发事件的一种畸形反抗，虽然这种反抗是代价最悲惨也最徒劳无功的。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或者说哪些生活观念与生活状态促成这一悲哀的现象？回到国人普遍的生存状态中，或许能寻到点解释的蛛丝马迹。每个社会都有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在前现代的西方社会，无数宗教徒把死后的永生作为最重要的人生取向，这也就成为那些社会的主流共识。

然而回到中国，百年以降，中国经历了传统的崩溃与现代化的多元，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权力与暴力共存的生活环境让很多人对于生命失去了尊重。联想到近来频发的暴徒袭击人群的恐怖案例，很多人失去的不止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尊重。这种无法认清现实环境而产生的反抗是最危险的，无论是轻生还是蔑生，都是对这个时代不公、不平、不义以及生活中的不顺，使用了错误甚至罪恶手段的控诉与反抗。

我认为这种反抗是最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是自杀还是杀别

人，造成的结果就只是“惨剧”两个字，现实不会因此改变作出任何改变。自杀与美好生活，真正的逻辑并非是自杀能带来美好生活，而是通过自杀现象来审视现实，重新建构我们的美好生活。作为生者，我们能做的是在生活中更加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尽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和制度变得正常一些，在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创造更多的温暖与善意，以使那些对自己的存在价值有所怀疑或者轻易断定自己生之不必继续的人们还能增加一点点留恋的生趣，因为那也许同样随机性地激起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

（责任编辑：王晓笛）



## 守望者：黑色的欲望， 黑色的选择

王晓威\*

守望者，watchman。架空的1985年，核弹危机。

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Comedian 在享受电视剧的时候被闯入者残酷地殴打，“It's a joke. It's all a joke. Mother, forgive me.” 便被扔下高楼。那个黄色的笑脸标志，甜甜的微笑，沾上了血迹。

一场疯狂的就像是噩梦的追逐，开始了。罗夏，用他的日记，记录每一个时间。

丹尼尔、乔和劳丽，各自面临着自己不得不面对的价值观的艰难抉择，奥兹曼迪亚兹，则在阴谋中贯彻自己的所谓智慧。

一切都在南极有了结果：奥兹曼迪亚兹终结了核弹危机，罗夏选择了放弃生命，丹尼尔和劳丽在一起，乔，选择离开这复杂的地方。他们，继续守望这个世界，这个复杂、黑暗、充满欲望恐惧罪恶的，世界。

整个电影创造的氛围便是阴

雨连绵，充满黑暗街道。小混混、黑帮、妓女，监狱暴乱，政治集团猜疑，核弹威胁。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中，却没有任何插曲充满阴郁。轻快悠扬的调子、口琴吉他，倘若没有对应的画面，便拥有一种惬意的美，格外渺远。

可是，一幅幅残酷的现实的画面：出名、自杀、荣誉、相聚、谋杀、微笑、争吵，苏联人面对战机与导弹的冷酷，警察面无表情地对游行人群开枪，和这种欢快的曲调，所构成的，已经不仅是讽刺了，它满足了人生或是这个世界的第一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原则：没有绝对的压抑，压抑中也会有转瞬即逝的轻松。

奥兹曼迪亚斯最后说出了Comedian 才是正确的，而他却是其他守望者难以理解的虚无主义者肆意而为的冷酷混蛋。谁都不该死谁也没杀了谁，最聪明的人和神一样的存在。“It's a joke. It's all a joke.” 又论证了这个 god damn it 的世界就是一个荒谬的笑话。“揭发我的话，你就会葬送，这么多人的死所带来的和平。” 奥兹曼迪亚斯没死。“揭发阿德里安只会让世界重新陷入核战中去。” 乔最后选择离开。“永不妥协，即便是在哈密吉多顿（世

\* 王晓威，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面前也不妥协。”罗夏却选择死在乔的手中。街道上空,出现了久违的阳光。

每个角色都有他的影射含义:罗夏,幼年的阴影使他没选择屈服和软弱,而是选择以暴制暴,这较之乐观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不一般的力量。人生的抉择无非于此。乔,理论物理学家,最后成为了神一样的存在,哲学空洞的眼神使他忘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他杀戮没有同情,但第一次恋爱的记忆还是曾留在他的记忆中,细腻美好精准。选择远离,守望,或许是不适合这个世界尔虞我诈的科学家的最佳选择。Comedian,艾达,肆意而为,从不理会他人的感受,但他每一种行为都有他自己的意义:

去你的对“没必要使用暴力”的“FUCK YOU”,也去你的“没必要使用暴力”。

“谁伤害他们?”“还用说?他们自己!混蛋。”

“美国梦是怎么了?”“美国梦是怎么了?!实现了!!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满目疮痍,暴乱平息后的狼狽街道。

他的难过却是脆弱的:“It's a joke. It's all a fucking joke. 知道

吗,我原以为我知道呢。我以为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疯狂。我做了那么多坏事,我对女人们做的坏事,我还杀过孩子。你知道吗?不过这,这是该死的战争!我可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在这,肠子都快出来了。对我的敌人来说……真相就是……对于朋友来说,你够义气了,俗话是怎么说来着?……SH IT”

这个世界有光明也有黑暗。黑暗,自有他的意义。曾经,黑暗是罪恶的象征是光明的敌人。但现在欲望,作为人存在与发展的意义,让这个世界不存在曾经我们熟知的正义。

每个人都要经历生死一般艰难的价值抉择,而这种抉择无论结果是牺牲他人还是牺牲自己,都早已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的界限。

有时,乐观不是最佳选择。

那种痛彻心扉的黑暗,那种对世界深深的憎恨,或许是因为他曾经深爱着这个世界。

后记:黑暗主义并不一定反人类反社会。它是将现实的残酷与无奈无限制的加和与扩大,以一种毫不留情的眼光剖析人性。反映美好的电影,通过细腻的场

景与心理描写，可以创造出一个人温润的世界，触动人心美好的弱点。而反映黑暗现实的电影则更像无情的医生，撕开欺骗与冷漠的伤疤，对着欲望的伤口喷洒酒精。无论是黑暗的眼光还是轻松的风格，它们都愿唤起人心深处的一种思考，不管是对美好事

物的珍惜还是对未知的恐惧。

美好的事物让我们忘却尘世的纷扰，在宁静中禅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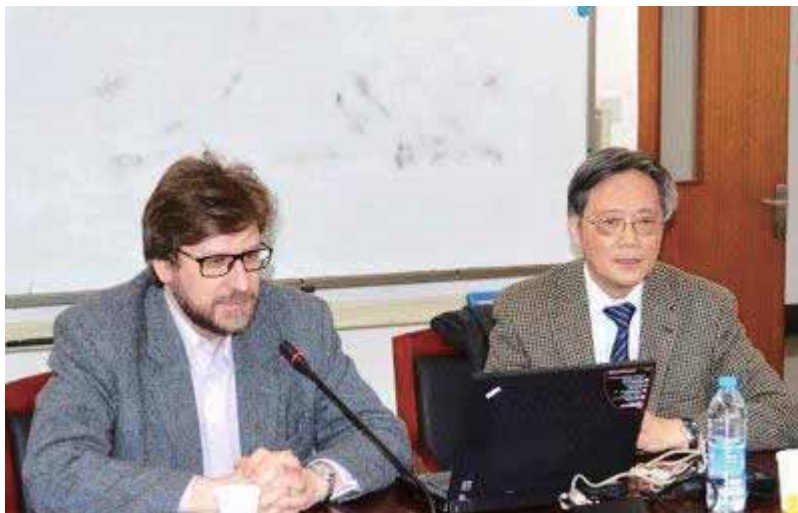
黑暗的罪恶给我们当头棒喝，提醒我们人生，世界的真实与残酷。或许也能让我们再次记住身边的光明与幸福。

（责任编辑：王晓笛）



## 专题报道

###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 费·卢基扬诺夫到访我院



2014年，乌克兰局势不断转变，受到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2014年3月22日，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卢基扬诺夫教授应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的邀请到访我院，针对近期的乌克兰局势问题进行了主题讲座。讲座由冯绍雷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波副教授、我院王海燕副教授、姜睿副研究员、郑润宇老师、张昕老师、高晓川老师、贾浩老师以及部分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卢基扬诺夫教授也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国际顾问委员，兼任《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作为俄罗斯著名学者，他在俄罗斯国内外享有盛誉。在演讲中，卢基扬诺夫教授回顾了乌克兰过去20年在俄欧之间摇摆的历史，指出乌克兰拥有地理优势且富含石油、天然气

等能源。若是在建国之处重点解决民族问题，当下的乌克兰悲剧或许不会发生，但现实是，乌克兰的政治关系是寡头之间的互争。

有关乌克兰动荡局势发展的原因，卢基扬诺夫教授认为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的发展对乌克兰局势有着重大影响，目前的乌克兰局势是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同时，卢基扬诺夫教授也谈到了乌克兰民众对局势的影响，乌民众一直认为乌克兰会加入欧洲，但结果是乌克兰没有加入欧洲且没有任何解释，再加上乌克兰政治关系的现状，乌民众面临的是无希望的未来，因此，小型抗议活动逐渐增多、扩大。

在此基础上，卢基扬诺夫教授分析了俄罗斯在新形势下的外交转向，指出俄罗斯会加快其东向发展，但这种转变是复杂的。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全新历史的开始，俄罗斯之前的发展模式已经完结。就俄罗斯国内而言，卢基扬诺夫指出人们无论是否持有开放的态度，但大都认为目前的状态需要改变。

随后的卢基扬诺夫教授与参与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互动，就有关欧亚联盟的现代性、东向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普京行为的战略考虑以及中俄关系及走向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卢基扬诺夫教授指出，有关克里米亚的问题，这是二十多年来，俄罗斯第一次不是在失去，而是在获得。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网站）

（责任编辑：杨晓娜 古娅珂）



## 李成谈“美国思想库：缘起、发展与前景” ——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



2014年4月21日，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研究员访问我院，并应邀在我校中北校区理科大楼A510报告厅做了题为“美国思想库：缘起、发展与前景——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的演讲，此次演讲也是我校百场校级学术讲座之一。讲座由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我校社科处的同志出席了此次讲座，同时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及我校的师生也一起参加了讲座。

在讲座中，李成教授先后讲述了美国智库的缘起、发展，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全球传媒革命时代代际变化的挑战，对智库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关于美国智库的缘起，李成教授首先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了介绍，他认为智库主要扮演知识传播者、研究掇客和政要储备池的角色，属于非营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但智库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因此它成为了实际上的“第五种权力”。其次，李成教授分析了美国智库产生的原因与背景，包括政治多元化、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两党轮换对人才的需求、美国民众对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社会及企业的慷慨捐助、媒体日渐强大及其需求等。最后，李成教授介绍了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成立的历史、使命及其运营管理体制。

接着，李成教授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分析了美国智库的发展，切入点为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高质量”指向布鲁金斯学会一直致力于寻找具备“学术领头、工作经验丰富、前瞻性、公共政策对话主导者”等特质的人才，“独立性”是指布鲁金斯学会的核心理念在于“中立的定位、宽容的立场、多样化的政治参与”，“影响力”则是针对智库在书籍、杂志、报刊、网络媒体等方面开展的宣传工作。李成教授通过对布鲁金斯学会的具体分析指出强大的人才资源、智库内部的纪律约束以及智库的宣传工作伴随着美国智库的发展并未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关于美国智库发展的前景，李成教授主要介绍了在全球面临媒体革命的情况下，布鲁金斯学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应对举措。除此之外，他还讲述了布鲁金斯学会培养青年助理研究员的心得。演讲结束后，李成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最后，整场讲座在掌声中结束。

李成教授不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而且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理事、美国国会美中工作组学术顾问组顾问，并且曾任汉密尔顿威廉·柯南政府学教授，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汉密尔顿学院政府系代理主任，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等。他以他丰富的知识积累和经验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讲。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网站）

（责任编辑：杨晓娜 古娅珂）

## 院内播报



2014年3月4日，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南亚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杰弗瑞·佩恩到访我院，并作主题为“从海湾到东南亚”的演讲。讲座由张昕老师主持，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王海燕副教授、郑润宇老师以及国关院部分学生参加。

2014年3月14日，著名华人学者黄枝连（Huang Chih-Lien）教授访问我院，并在理科大楼 A510 作了题为“走出‘2.0’，走向‘3.0’的发展道路：探索‘3+2+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发开展及其国际意义”的精彩演讲。此次讲座由我院杨成副教授主持，校内外众多师生参与其中。

2014年3月22日，应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的邀请，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卢基扬诺夫到访我院，针对最近乌克兰的局势问题进行主题讲座。讲座由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持，我院王海燕老师、贾浩老师等，以及部分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



2014年3月24日，来自哈萨克斯坦总统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首任总统与国内政策中心主任阿姆列巴耶夫·艾达尔在理科大楼 A404 开展了题为中亚与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系）的讲座，我院研一年级同学参与了会议，会议取得良好效果。



2013年4月21日至22日，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研究员访问我院，并在中北校区理科大楼 A510 报告厅做了题为“美国思想库：缘起、发展与前景——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的精彩演讲。此次讲座由我院院长冯绍雷教授主持，来自市教委和我校社科处的同志也莅临现场，同时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沪上高校的师生与我校的师生一起参加了讲座。

2014年4月24日，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学院教授 Brantly Womack 来我院在理科大楼 A416 开展题为“亚洲与非对称”的专题讲座，讲座由我院张昕老师主持。我院研一及研二年级同学参与了讲座，讲座上教授与学生们展开了丰富讨论。

（责任编辑：叶锐）

## 院外来音

**“读史读经典”****——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为本科新生解读《史记》**

2014年4月15日，由国际关系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人民大学“读史读经典”系列讲座第三场在公教1101教室开讲，我院时殷弘教授从政治战略与政治经验的角度为全校本科生解读《史记》，独特的视角吸引众多同学前来领略千古名著的魅力，500人的教室座无虚席。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国箴务实论坛”****——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系列讲座第六讲成功举行**

2014年4月24日下午国箴务实论坛第六讲在文科楼725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政治学系副教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长忠博士就“拐点——走向有机政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意义”进行主题讲座，学院党委书记刘季平老师主持了讲座。随后，学院政治学系师生分别提出了关于政党自身的建设、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相结合、拐点的内涵、国家治理的社会层面思考、政党统合社会功能的新方式等问题。郑长忠老师分别给予了解答。

（摘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举行“全球地区一体化发展趋势及中国 FTA 战略”报告会

2014 年 5 月 7 日晚，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成功举办题为“全球地区一体化发展趋势及中国 FTA 战略”报告会。国家商务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张少刚先生担任主讲嘉宾，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亚洲研究院院长、中国委员会执行主任肖逸夫（Yves Tiberghien）教授担任点评嘉宾。

（摘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 著名冷战史研究专家翟强教授主讲“国际学术界有关‘文化冷战史’的研究”

2014 年 4 月 25 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职工午餐会邀请到了著名的冷战史研究专家、美国奥本大学蒙哥马利校区历史系教授翟强作为主讲人，题目是“国际学术界有关‘文化冷战史’的研究”。在讲座中，翟强教授从三个层面对国际学术界“文化冷战史”的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一是对于“文化冷战”动机的研究；二是对于“文化冷战”操作和实施的分析；三是对于“文化冷战”效果的评估。

（摘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苏毓淞博士做客清华国关“新知论坛”

2014 年 4 月 11 日下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新知论坛第 19 期在明斋 315 举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苏毓淞博士以“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Policy: A Survey-Embedded Experiment in Beijing”为题做了精彩主题演讲。孙学峰老师主持了本次论坛，系研究生积极参与了本次论坛。

（摘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责任编辑：杨晓娜 叶锐）



## 征稿启事

这是一份学生刊物，

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我们相信：与天下才俊共闻天下之大道，  
相互切磋、互相发明，已是世间最大的快事。

这是一份学生刊物，

没有太多的现实功利。我们深知：象牙塔乃真理的永恒故乡，  
与真理为友，学无止境、止于至善，正是学者固有的天职。

这是一份学术思想刊物。

“思想无禁区，学术有真知”，是我们的执着追求。

我们知道，真正深邃的思想与艰深的学术背后，  
无不挺立着强健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格，或许还有高贵的灵魂和卓绝的见识。

《闻道》属于年轻人，属于与你我一样的年轻人。

他们怀揣梦想，勇于创造，他们嘲笑对过去的迷恋，

蔑视陈规，反对纠结于历史——因为，未来注定属于他们！

所以我们向你——我们亲爱的朋友，征稿。

我们恳请你惠赐佳作，我们需要你的声音，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我们需要你敏锐的思想与激昂的豪情。

冷静艰深如学术论文，热情饱满如诗歌散文，

快意笑笑如思想、情感杂论……好文、妙文、怪文、奇文，皆受欢迎，

总之我们鼓励学术思想争论，鼓励批判性思考，鼓励心灵情感独白。

当然，对于来稿，我们不得不有所筛选，但我们保证，会认真对待每一篇稿子，

会尊重每一位朋友的文字、思想与情感。

对于学术文章，我们强调严格的学术规范。

若来稿得到采用，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酬劳。

朋友们，请与我们结伴而行！

来稿请发送至：[ggwendao@gmail.com](mailto:ggwendao@gmail.com)

《闻道》编辑部





**封面故事：**

油画描绘的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飘扬着大清黄龙旗的中国军舰行将被击沉的一幕。今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祭，时隔两个甲子，这段历史仍值得我们深思。